

4

DEC.2017

NO.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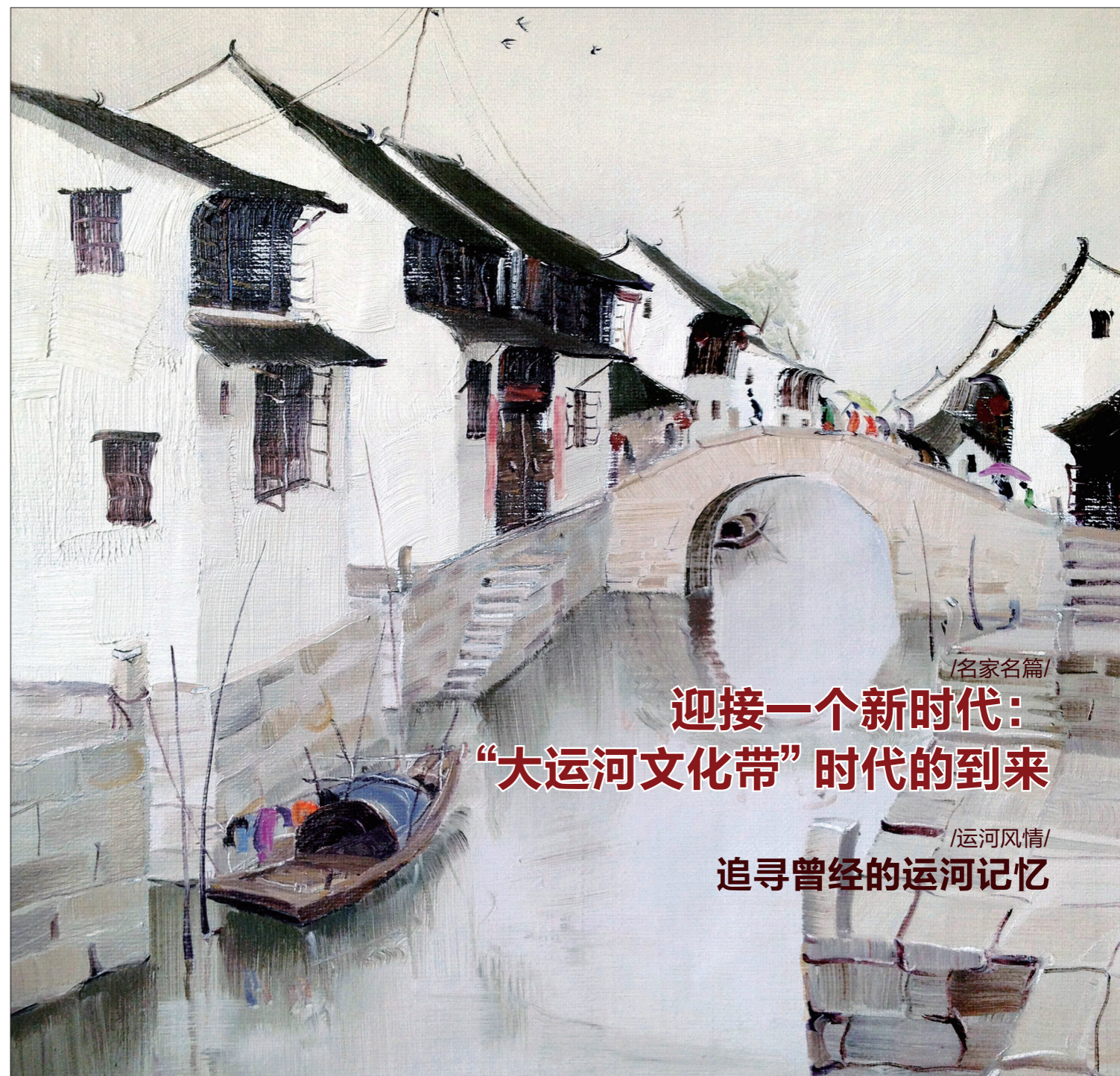
总第7期·季刊

# 运河

南端

CANAL·SOUTH

CANAL·SOUTH 运河·南端



/名家名篇/

## 迎接一个新时代： “大运河文化带”时代的到来

/运河风情/

## 追寻曾经的运河记忆

季刊 第四期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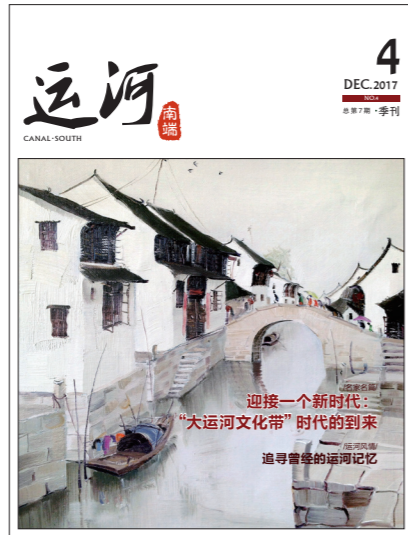


智慧一点通



杭州京杭大运河博物馆





4  
DEC. 2017  
NO.4  
总第7期  
季刊

主管：杭州市拱墅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体育局）  
主办：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

编委会主任：陈宁  
编委会副主任：刘德龙 汪小含 陈展  
编委：阮利平 陆菁 沈丽红 谢爱弟  
文闻 黄莹 许赞 焦明  
杨芳 夏菡茜 张建青 孙辰霏  
杨建英 乔国良 江小娟 胡恩华

主编：叶艳萍  
执行：陶林  
责编：周佳  
设计：杭州解文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编辑部地址：杭州市拱墅区运河文化广场1号  
邮编：310015  
投稿邮箱：dyhbwg@163.com  
电话：0571-88162078



智慧一点通



杭州京杭大运河博物馆

## 玉色运河

◆谭红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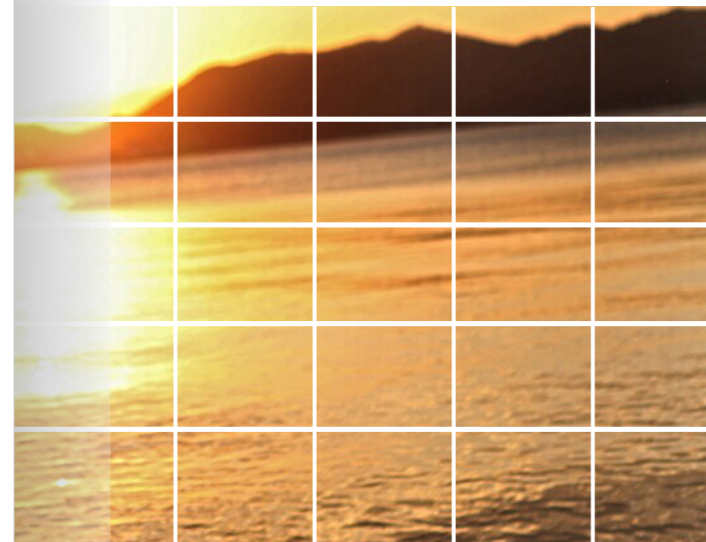
一汪运河水，以千年的年轮为眸，以河畔的绿黛青柳为眉，清澈着两岸人家彩虹似的梦。

是长江母亲的远房小妹妹，从诗词浸润的传说脱俗而来。温柔是你的婉约脾气，一直躲在月下的深闺绣着风调雨顺的女红，为江南的美女和遥远的北方汉子编织起一根心相印的红丝线。

如玉的凝脂肌肤流过春，则种植起千里万里厚的花红柳绿；流过夏，南端那个名城善舞的水袖撩人回眸；流过秋，把天下苏湖的粮仓装满渴望；流过冬，把贮藏幸福的寒冷敲打得红红火火。运河如玉，挂在俊俏华夏的脖颈，护佑日子文静如水的平安，祈祷未来如金鱼跃起的风光美。

灯光中的河之寐，如睡熟的一词浣溪沙、早卧的小令一剪梅，惹人爱要人怜。把远游打渔似的游子的相思吹皱裂，荡起层层涟漪。

运河如玉，玉的运河，晶莹剔透地反射她秀美的掌故入我梦入乡愁，如点点春雨。



# 目录

CONTENTS

## 卷首语

- 01 玉色运河 谭红林

## 名家名篇



# 06

- 迎接一个新时代：  
“大运河文化带”时代的到来 李冈原

## 运河故事

- 20 心中的“刀魂” 倪蒋磊



# 30

## 运河风情

- 追寻曾经的运河记忆 王昌卫

## 运河风情

- 26 寻梦台儿庄 木木

## 运河史话

- 40 治河与藏书  
——道咸之际的南河总督杨以增 王云
- 58 《荷使初访中国记》所见清代运河风情考述 胡梦飞



- 65 连接南北水网的“过塘行” 龚玉和

## 运河遗存

- 70 流淌千年瓷韵 见证运河繁荣 戚帅华
- 74 德胜坝遗址 安峰



82

八面来风

守住拱墅的根和魂 留住拱墅乡愁记忆

拱墅区大运河文化研究院成立  
老物件展从1月18日持续到3月4日



84 好“运”“河”你相伴  
——2018年元旦拱墅区再开启“走大运”活动

86 第四届“解文杯”运河幼儿故事大赛落幕



八面来风

运河文化沙龙

封三 / 解文教育



大运河作为我国唯一「在用」的世界文化遗产，不仅是一条积淀丰厚的文化遗产长廊，更是一条活着的、流动的、发展的经济和文化黄金廊道……



## 迎接一个新时代：“大运河文化带”时代的到来

撰文 | 李冈原



李冈原教授，浙江杭州人，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硕导，中国世界近代史学会理事、浙江省历史学会副秘书长、杭州市政协“三亲史”基地主任、杭州师范大学口述史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英国史、宗教艺术、民族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口述史。

2014年6月，在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46个世界遗产项目。大运河的文化价值开始被全球所瞩目。

2017年2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大运河森林公园时强调，保护大运河是运河沿线所有地区的共同责任，北京要积极发挥示范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就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将运河遗产保护好、利用好、传承好。建设大运河文化带，助力大运河所贯通的黄河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转型升级。同年召开的国家文化产业创新试验区高端峰会上，大运河文化带研讨会作为峰会重要的分论坛，发布了《大运河文化带调研报告》，并就大运河文化带的文化遗产保护、文化基因传承、总体规划编制、沿线统筹协调、管理体制创新、宣传推广等话题进行研讨。随着这些话题进入各级政府和公众的视野，保护好、利用好、传承好运河遗产，建设大运河文化带，正在运河沿线逐步展开。

大运河作为我国唯一“在用”的世界文化遗产，不仅是一条积淀丰厚的文化遗产长廊，更是一条活着的、流动的、发展的经济和文化黄金廊道。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背景下，如何挖掘保护、传承创新、整合利用好大运河的文化资源，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与战略价值。

大运河肇始于春秋，建设于隋代，繁荣于唐宋，取直于元代，疏通于明清，断航于清末（这里指的是全线断航）。大运河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代。

第一个是春秋时代。

运河始建于历史上的春秋时代。吴王夫差为了解决军事物资补给问题，于公元前486年，征调民夫从扬州附近开挖运河，沟通长江与淮水，形成后来京杭大运河的邗沟段。地跨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河南和安徽8个省市，是世界上开凿时间较早、规模最大、线路最长、延续时间最久，而且目前仍有1100多公里在正常通航的运河，发挥着重要的交通、运输、行洪、灌溉、输水等功能，被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委员会在《国际运河古迹名录》中列为最具影响力的水道。

第二个是隋唐宋漕运时代。

这个时代的大运河是运河昔日最辉煌的时代，鼎盛时期大运河长达近两千公里。这个时代包括隋唐宋三个朝代。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沟通南北漕运。

第三个是元明清时期。

到了元代，大运河被截弯取直，里程大大缩短。从此，大运河成为南粮北运的大动脉、维护国家统一的战略运输线。

以北京、杭州为起始的京杭大运河进一步与从宁波入海与海上丝绸之路相连。



纵观史乘,在中国历史上,大运河北起北京南到杭州,全长约 1797 公里的中国大运河沟通了北方的政治中心和南方的经济中心。大运河不仅贯通了中国五条东西向的主要河流,也联通了中国历史上的七大古都,支撑了隋唐之后中华文明的持续发展和长期繁荣,维护了中华帝国的长期统一,以其航运、防洪、灌溉和生态涵养等功能,成为华夏腹心地带的主动脉,使得南方的粮食源源不断地北上,缓解了北方人多粮少的局面,促进了封建国家的稳定统一。大运河甚至贯通了陆上与海上的丝绸之路,沟通了内地和外贸关口,使得无论是出口的瓷器、茶叶、丝绸,还是进口的珠宝、香料和棉毛等制品都能通过它运往海港,输入内地。

但是,随着海运、铁路、公路等运输的兴起与环境变迁,大运河的原有功能渐渐退出历史舞台,基本上成为一种历史遗迹和地理景观。大运河作为沟通南北交通要道的漕运时代总体上已告终结,但它作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新时代正在开启。新时代赋予大运河以新的价值和功能。由此可见,积淀千年的大运河,成为以华夏文化乃至东方文化价值的重要组成,亟待我们保护传承开发利用,迎来更加辉煌的“蝶变”时代。

大运河作为巨型物质文化遗产,又处于人口高度密集地区、沿线城市经济社会中快速发展的新形势下,大运河文化的保护显然是一项非常紧迫和高度繁难的事业。经过近 40 年的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尤其是进入大数据、人工智

能的全球化时代之后,我们正在迎来了一个文化需求高速增长、文化发展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阶段,大运河作为一张闪光的世界级文化名片,应该可以成为杭州乃至运河沿线城市文化建设的绝佳切入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有力支撑点。

## 二

如何“跳出”杭州,借鉴沿线省市建设的经验,思考下一阶段杭州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何去何从,已然提上了议事日程。

迄今为止,沿大运河已有两市六省开始制定了运河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旨在保护运河文化的原真性、完整性、系统性和不可替代性。探索在宏观和微观层次上形成人与河之间的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关系,形成对运河文化带全面深刻的认识和系统科学的界定,并在严格保护的前提下、扎实研究的基础上,将大运河建设作为国家层面中东部复兴战略组成部分。

各地正在利用规划的力量,从宏观上加强顶层设计,出台中长期的总体性的建设规划,指导各地将运河与所在区域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紧密科学地结合起来,焕发运河历史城市的新活力。

据悉,为更好建设大运河文化带,中国大河流经的 8 个省市均已对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作出了规划和部署,本文以江苏和浙江为例简述其做法。

1. 建设大运河文化带江苏省的规划和部署  
大运河江苏段纵贯江苏全境，全长约 700 公里，流经徐州、扬州、苏州等 8 个城市，联通了长江、淮河两大河流，太湖、高邮湖、洪泽湖、骆马湖、微山湖等五大湖泊，江苏拟将楚汉文化、淮扬文化、吴文化等地域文化有机串联起来。

从遗产带来看，江苏有遗产河段 325 公里，占运河全线的 1/3；遗产区 7 个，占遗产区总面积的 46%；遗产点 22 处，占总数的 40%。从文化景观带来看，江苏大运河途径的 8 市均为国家园林城市和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以扬州瘦西湖为代表的 5A 景区 16 处，国家旅游度假区 4 座，4A 级景区、省级旅游度假区占全省的 70% 以上。

大运河江苏段是航运价值最高的水道之一，以长江为界分为苏南运河和苏北运河。苏南运河是大宗建材等物资的主要运输通道。苏北运河则是国家北煤南运的黄金水道，如今每年货运量已接近 1.2 亿吨，其中煤炭运量达到 7300 万吨。水运在江苏省货运周转量中已经占到一半，在货运总量中占四分之一。

江苏是全国首个提出文化遗产、文化产业和文化旅游等相结合，涵盖大运河江苏段沿线城市范围，全面建设大运河文化带的省份。为了缓解运河开发与遗产保护之间的矛盾，江苏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坚持“城市建设服从古城保护，古城保护服从遗产保护”的原则，依托运河沿线遗产资源，打造最富文化内涵、最具地方特色、最具观赏价值的文化旅游精品线

路，在开发利用与保护传承中走出了一条双赢之路。

《江苏省“十三五”文物事业发展规划》提出，全面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完成中国大运河（江苏段）遗产保护规划修编工作，完成大运河遗产保护与展示示范工程，促进运河遗产科学保护与合理利用。江苏是大运河沿线河道最长，流经城市最多，运河遗产最丰富，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点段最多的省份。

2016 年，江苏提出并推动江淮生态大走廊规划建设，以大运河为主干线，以扬州、泰州、淮安、宿迁和徐州等沿运河城市为规划范围，共建共享江淮生态大走廊。在坚持保护优先、生态引领的前提下，打造世界跨流域生态廊道建设的样板区和淮河流域东部生态屏障。

目前，扬州在完成初步规划的基础上，启动先导区建设，把淮河入江口和南水北调东线源头地区约 80 平方公里作为先导区进行建设，已完成沿运河船厂、砂石场搬迁和环境整治，并以人大决议的方式对淮河入江水道上的“七河八岛”区域实施“四控一禁”，同时在沿线基本建成了 9 个 10 平方公里以上的生态中心。扬州还在造船厂原址上建造国内首座运河船舶文化博物馆，以工业遗存作为展示内容，弘扬传承运河文化。博物馆规划分两大板块：主展馆和“船之韵”文化主题公园，通过图片、视频、实物等来展示大运河边曾经辉煌的造船史、运河城市的微缩景观，传承弘扬京杭大运河船舶和运河文化。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建设大运河文化带的每项工作都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世人的评说，要高标准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重点工作。在工作思路要坚持“文化为魂”，打好“特色牌”，做到“点线面”联动。为摸清“家底”，江苏组织专家学者进行调查研究，摸清大运河江苏段的文化资源、保护现状、存在问题、发展潜力；积极推动大运河从“地理空间”走向“文化空间”，突出打好文化牌，在保护历史遗存的基础上，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将运河沿线文化亮点连起来，实现“一条河尽显江苏文化之美”；保护利用好“有形”“无形”的文化遗产，建设一批大运河遗址公园和文化博物馆集中展示运河文化，打造一批凸显运河特色的会展、演艺、民俗等品牌活动，创作一批反映运河文化的精品力作；加快推进运河沿线环境整治和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河道整治，推进沿河陆路贯通，提升运河流域生态环境。

## 2. 建设大运河文化带浙江省的规划和部署

中国大运河浙江段包括江南运河（嘉兴—杭州段）和浙东运河。江南运河为京杭大运河的南段，北起江苏镇江，南至浙江杭州。浙东运河又名杭甬运河，西起杭州市，东至宁波市甬江入海口，全长 239 公里。

作为京杭大运河的最南端以及浙东运河的起点，杭州是中国大运河的一个重要节点，列入遗产河道总长 110 公里。杭州段首批遗产点段共有 11 个，包括富义仓、凤山水城门遗址、桥西历史街区、西兴过塘行码头、拱宸桥、广济桥等

6 个遗产点，以及杭州塘段、江南运河杭州段、上塘河段、杭州中河—龙山河、浙东运河主线等 5 段河道。

浙江大力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省级层面要抓好规划引领和工作统筹，加强与运河沿线省、市的工作沟通联系，加强省内沿线 8 市的工作统筹，相关部门要明确各自责任和分工。市县要抓好任务落实和工作联动，加大推进力度，在运河遗产保护、资源开发利用、文化展示传承等方面创造特色、走在前面。要加大社会宣传力度，讲好运河故事，传播运河文化，动员社会各方广泛参与，形成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强大合力。浙江省还出台了《大运河文化带（浙江）建设工作方案》。

根据旅游休闲产业规划，杭州市港航局、杭州市规划局等将做好运河区域水上休闲水域的利用，以及码头布局规划的编制，以运河区域的休闲产业开发带动周边区域的发展。

就杭州段的大运河而言，目前围绕打造东方文化国际交流重要的国际化城市、建设世界名城的目标，在运河两岸已形成了一条以自然生态景观为核心主轴，以历史街区、文化园区、博物馆群、寺庙庵堂、遗产遗迹为重要节点的文化休闲体验长廊和水上旅游黄金线。充分发挥了杭州作为旅游城市的特点，将大运河物质文化遗产与精神文化遗产完美结合，并丰富国际化旅游的形式和内涵。

更加喜人的是筹划了 27 年的“运河二通道”，宏大工程已经开始施工了。兴修连通运河

和钱塘江的航运通道是项“孕育”了数十年之久的工程。它完成之际，也是杭州成为浙江乃至华东地区物流集散中心之日。

早在 1989 年，此项工程就开始设想，并提交了课题研究报告。但因整治工程跨浙江、江苏两省，嘉兴、湖州、杭州三市，这其中的沟通和协调，相当复杂。无数次的商谈、对接、修改，只为选择一条最合适的线路，迎接最美的“开花结果”。

2004 年，运河二通道方案论证报告完成。2005 年，京杭运河沟通钱塘江第二通道工程预

可行性研究报告（初稿）完成。2008 年，国家发改委对京杭运河（浙江段）三级航道整治工程项目建议书进行了批复。此后，该工程又几经勘测、试验、研究，几易其稿。

2017 年 12 月 30 日，塘栖古镇，随着挖掘机的轰鸣声，京杭运河（浙江段）三级航道整治工程杭州段正式启动。预计最快 2020 年建成。不久的将来，不仅大运河的通行能力将从 500 吨级提升为 1000 吨级，杭州还将多出一条全新的“运河二通道”，千吨货船可以从山东直达杭州。





这是史无前例的壮举，在充分利用古运河的基础上，必将开启提升杭州文化软实力、加快城市国际化、建设独特韵味别样精彩的世界名城的新愿景。这一壮举，是“利用好”的最好诠释。

### 三

故此，我们提出了杭州文化名城的建设应高度重视中国大运河文化产业带的构想，从新的历史维度与空间维度，为运河文化普世价值的彰显寻找突破点。为杭州作为运河沿线城市之一员，充分利用运河文化，加速城市发展寻找文化新路径、新契机。怎样利用大运河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很多，其中包括科学认识大运河的文化价值。

1. 关于重新认识、深度挖掘大运河文化价值的重要性。

京杭大运河的文化功能需要重新明晰化。在重新认识大运河文化价值的基础上，重新认识深度挖掘大运河文化价值，才能进一步明确定义什么是大运河文化产业带。发挥运河文化的价值，不仅仅是局限在某个遗产点，或是某个河段上。这就存在“点、线、面”的问题。既要抓住一个个历史文化遗产点，也要关注整条运河带上文化资源的线性串联。同时，以大运河为轴，还存在一个向外辐射，形成文化遗存“面”的问题。要在运河的

历史文化和现代文明中找到新的平衡点，实现运河文化的升华，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养料，从而实现运河文化功能的华丽转身。

在大运河沿岸文化景点开发全面规划的“后申遗时代”，不能仅仅考虑经济效益，更应该考虑运河文化对下一代的教育意义。将景点的开发与教育基地的建设结合。让下一代青少年了解运河的发展史，从中认识民族文化遗产的精髓应是题中之义。运河的开发和运营的历史蕴含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改造大自然的智慧。这笔民族的宝贵精神遗产，我们这一代人有责任继承和发扬下去。谨以郭守敬开发运河北段的个案为例，他留给我们的精神文化遗产以及科学价值也是不可估量的。

“后申遗时代”大运河文化的开发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令人惋惜的是多限于旅游价值的挖掘，却没有与地方教育紧密结合。运河文化开花，教育似乎不搭界。

此外，还应关注到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之一是发挥地区性的优势。文化艺术的价值核心是它的社会教育功能。只有接触公众，接触青少年，其核心价值才能真正得到发挥。如杭州戏剧的发展已经走向校园，包括京昆越在内的各剧种正进入大中小学的课堂。杭州在开发和利用运河文化遗产也有如何走差异化发展之路，充分发挥地方戏剧的优势的空间。

2. 关于城市文化建设。

城市是一个综合生命体。它有自己的音色、气质、颜值、情调、表情、体温和性格。京杭大运河沿线18座城市，各有特点。建设大运河文化产业带，不是让所有的城市文化都整体划一地“向运河文化靠拢”，而是以运河文化为平台，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百舸争流”的区域韵味。沿线各个城市以“入遗”为机遇，充分挖掘本地运河相关文化的历史资源，通过活化运河历史文化，将其融入到当代中国城市文化建设的大流中去，打造特色化运河段的城市群尤为重要。譬如：通州运河终点的码头文化、沧州因运河贸易形成的商贸文化、扬州因河而盛的民俗文化、徐州的汉文化等等。虽然都在运河沿线，但是却逐渐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特色。在此基础上，文化产业的建设，也需要更有定位，走差异化发展路线。杭州如何擦亮运河文化的金名片，在开发杭州运河文化资源中如何“有所为，有所不为”，这是篇大文章。看准的就要做好，不具备开发条件的要完善保存留给后人。

3. 物质文化遗存和精神文明传承的深度融合。

今年年初，《国务院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正式出台，这标志着国家更加关注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对于其他产业的提升作用。运河是一个巨大的载体，运河文化综罗万千。因此，要开发利用运河文化资源，就一定要强调“融合”。杭州运河文化产业带，不是简单的园林、水务等规



划，而是围绕“运河文化”形成一个水系特色明显的文化经济带，又各具特色的运河文化开发模式，实现城市与运河文化本身共同发展。发掘本土运河特色文化，建设具有鲜明运河文化特点的国际化世界名城，从而全面展示两千年来大运河的精神文明，才能真正做到传承好。

4. 各省市都有自己的运河文化开发规划，这就需要总体协调、分工合作。

运河文化产业带的建设，需要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同时也需要发挥市场的主体作用。在政府做好规划的同时，也要形成合理的协调机制和分工体系。协调机制，就是要以运河为主线形成 18 个城市全面合作的协同创新体系，市场无边界，任务有侧重。分工体系，一方面是政府和企业要形成良好的互动模式，在整个开放建设中，政府要做什么，企业做什么？政府要做顶层设计，企业要看利益，核心是获得利益。平台应该是政府做，企业要做的市场，要把市场要素做好。另一方面，各个城市也需要分工，各个城市根据自身特点因地制宜地发展文化产业，不好高骛远，也不妄自菲薄。

运河文化产业带的开发是一个系统工程，纵向上需要在国家、省、市甚至更具体的行政单元形成合力；横向上，需要运河沿线城市之间，城市文化、水务、商业等各部门之间等等齐抓共管，共同推进运河文化产业带的建设。只有通过文化产业的提升，城市才有更大的财力去支持申遗资源的保护与再开发；也只有在保护现

有文化资源的基础上，现代人才能创新创造出运河文化的新内涵。运河文化产业带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杭州应该在着力运河文化品牌引领、人才支撑、产业带动等建设上，探索新途。

5. 深入系统地研究运河文化的精神内涵，才有可能做到真正的传承。

运河文明核心是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和谐，顺应自然，而不是干扰自然。运河建设与毁灭的历史告诉我们：研究运河文化，包括研究静态的遗产，同时需要研究动态的遗产，即调查运河文化遗存的同时，又要深入研究运河发展变化的历史，认识其发展规律是十分关键的因素。杭州有条件也应该贡献出智慧和力量。

6. 多学科、跨文化综合协调开发运河文化  
大运河悠久的历史、漫长的航道构成了多元而又具有统一的运河独特的美学风格。

大运河的形成是自然生态与社会发展共同推动而形成的，而运河文化则是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以及当时的建设中积淀而成的。文化地理学从地表各种文化现象的分布、空间组合及发展演化规律，以及有关文化景观、文化的起源和传播、文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环境的文化评价等内容对文化组合进行研究。自 1920—1970 年代，文化地理学形成了 5 大研究主题：文化生态学、文化源地、文化扩散、文化区和文化景观。文化生态学讨论文化区是否由自然区决定；文化源地主题涉及文化最早出现在什么地方；文化扩散主题涉及文化自源地通过何种

形式扩散到其他地方；文化区主题涉及文化扩散后形成的各种类型区域的组织形式；文化景观是研究上述主题的切入点或观察对象。在传统的文化地理学中，如果将文化景观视为一系列符号，那么大运河文化带则是一张“有意义的流动地图”。“超文化有机体”为大运河文化带的文化整合提供了思路。如何打破行政区划的缺点，打破规划单纯由行政部门制定。设立多专业、跨文化工作委员会，由多学科、跨界的专业人员参与，共同制定大运河文化带的蓝图，不仅需要顶层设计的战略思维，还需要社会力量的因势利导，形成治运保运合力。

2017 京杭大运河城市旅游推广联盟年会，8月4日到5日，在无锡召开。以“游访美丽运河·活化运河文化”为主题，加强京杭大运河沿线城市地区的合作交流，以推广大运河城市旅游整体形象，彰显大运河在全国乃至世界的影响和地位，共同打造京杭大运河这条世界级精品旅游线，从而向全世界推介中国的“大运河旅游”。这是杭州实施国际化战略的一个难得的机遇。应在如何尊重大运河的地方特性下继续深挖。这是杭州大运河文化开发的重心。大运河文化带沿线城市的“文化水平”和“文化面貌”差异极大。“文化水平”包括沿线城市的文化资源、文化成果、文化设施等量化指标；“文化面貌”主要是大运河文化带的区域分异，诸如方言、宗教、风俗等。大运河文化带的持续繁荣离不开文化产业的支持，新经济地理学强调产业的“根植”。以现今文化地理学与经济地理学结

合最紧密的创意产业集群研究为例，可以看出地方制度文化对创意产业的影响，尤其是对创意产业集群的影响。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不同城市、不同乡村、不同区域要以自己的个性吸引投资和游客，就需要挖掘地方性。遗产保护的目的一在于维持“地方”的文化重要性。大运河沿线城市在不同时期已经开始运河文化的建设。其建设开发也强调维持一种地方感，因为具有文化重要性的“地方”，既是历史纪录，也是国家认同和经验的有形表现。杭州应尝试在互联网上构建大运河的公共空间、尝试运河景观的美学化、尝试运河文化的网上景观化，乃至在互联网上从事遗产开发、宣传环保和生态文明意识等等。鼓励引导网络文学企业以大力传承、阐释大运河文化为主题，启动作品征集活动，有计划有重点地培育孵化一批大运河文化题材文学作品，并向影视、动漫、游戏等领域转化，积极打造大运河文化精品 IP。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为构建大运河文化带的“第三空间”提供了技术实现的可能。而创意，才是让大运河的“第三空间”熠熠生辉的源源动力。

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我们必须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既要讲好“运河故事”、“中国故事”，更要讲好“杭州故事”，真正做到以文化人，以文化物，以文惠民。📖



心中的「刀魂」

## 心中的「刀魂」

撰文 倪蒋磊

对每一个从小在巷子里长大的人来说，都会有一个共同的记忆，就是那个坐在巷口上摆摊的手艺人。他可能是一个配钥匙的，可能是一个捏糖人的，也有可能是一个修自行车的。现代都市里已经很难看到他们的身影，可是在老底子的杭州城里，几乎每条巷子里都有他们的足迹，我家那条小巷子也不例外。

他叫哑巴，他只是不会说话，耳朵是可以听得见的。关于他是怎么变成哑巴的，也没有听人说起过，只知道自我记事开始，大家就都这样叫他。哑巴是一个磨刀人，因为不会说话，所以他并不能像其他磨刀人一样骑着自行车带着磨刀石，一路唱着“磨剪子类锵菜刀”穿梭在大街小巷中兜揽生意。哑巴在巷口放着一把藤椅，一张小桌子，藤椅上立着一块牌子，写着“磨

刀”，旁边的小桌子是让来磨刀的顾客放刀的。因为哑巴的手艺好，大家又都是街坊邻居，哑巴都是意思一下收点加工费，并不贵，所以附近的人都会来找哑巴帮忙磨刀。

磨刀是有专门的一套工具的，一张不长不短的条凳，哑巴坐在靠后一点的位置，有一小块木板在他身前，抵住肚脐，一是保护一下裤裆，二来也是为了让磨刀人和前面的磨刀石之间保持适当的距离。条凳的前端是磨刀石，一块固定在条凳上，另一块则是由一个轴承连着一个脚踏，只要脚一用力踩，石头就会转起来，由于摩擦生热，而磨刀时又不能戴手套，所以在磨刀的时候还要一边磨刀一边用水冷却。这样一个神奇的技艺，对于童年的小孩子来说，是相当有吸引力的，所以每次哑巴开始磨刀，我们这些住





在巷子里的孩子们就会围在他的摊子前面，看着他把一把把刀磨得闪闪发亮。

哑巴也是我们这条巷子里的居民，住在巷尾的一座小破庙里面。说是小破庙，那也是巷子里的老爷爷老奶奶们说的，但对于我们这些小孩子来说，这里不仅是一个破败的小院子，也是我们玩耍的小乐园。我们在里面踢皮球，追逐打闹，玩弹珠，折飞机，夏天可以抓蚰蚰，冬天还能堆雪人，一年四季都能在里面找到属于我们的童年乐趣。大人们也放心让我们在这个小破庙里玩耍，离家比较近，也没有车来车往，相对比较安全，只是经常会告诫我们，让我们不要太闹腾，吵着住在里头的哑巴。哑巴对我们这些小孩子很好，虽然小破庙里没有什么危险，但是我们在里面玩的时候哑巴总是会开着门看着我们玩，有时候跑来跑去摔倒了，他就会把我们带到他那里，擦一点红药水贴个创可贴什么的。只是哑巴看起来比较凶，总是板着脸，所以我们虽然知道他是个好人，但看到他总是不免感觉有点怕他。

在小孩子的生活里，除了玩还是玩，在小破庙里玩腻了，就会想着去巷子外面玩，虽然大人们再三阻拦，但是只要你想，总会找到办法溜出去，大人

怎么都是拦不住的。还记得那时候还没有现在这样的“五水共治”，河道也还没有拓宽，夏天的时候，只要接连下几天的雨，护城河的水就会涨得很高，而我们这些住在边上的孩子就“近水楼台”了，趁着大人不注意的时候偷偷的去河边玩水。这对于小孩子来说自然是一件危险的事情，被大人们知道了抓回去当然免不了一顿胖揍，每年电视上也都会有人在河里游泳结果淹死的新闻，然而这并不能冷却我们对于去河边玩这件事的热情，因为我们并不是去河边游泳的。

在河边玩耍的人其实并不少，而且不仅仅是我们这些小孩子，也有大人。水性好的自然会下河去游泳，不会水的，就会在河边找其他的事情来玩，比如钓鱼。我们小孩子就特别喜欢看大人在那里钓鱼，有时候甚至不是用钓的，而是用一个很大的木头架子，架子中间放着一张大网，把网放到河里，过段时间再几个人一起把网拉起来，网里头就会有好多活蹦乱跳的鱼，我们那里的人把这件事叫“扳鱼”。这样的事情就像磨刀一样，对小孩子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往往一看就忘记了回家的时间。

那天下午，我们几个小伙伴还是和往常一样，趁着大人们都去上班了，

而爷爷奶奶正在睡午觉的时候，偷偷溜出巷子，想去护城河边看扳鱼。刚走出巷子口，就看到哑巴正在他的摊子上磨刀。夏天的午后是很热的，平时哑巴都要等到三四点才会出来，但是因为今天有点下毛毛雨，并不是太热，所以他就提早出来磨刀了。哑巴看见我们，似乎知道我们是想溜出去玩，就比着手势指着巷子，意思是让我们回去。被他撞见的我们自然也是有点害怕，毕竟我们是溜出去的，但是想到他不会说话，平时又很疼我们，应该不会去告密，所以也就没管他的手势，继续管自己去护城河。

可能是在下雨，护城河边的人并不多，我们还是走到以前经常去看的那个大网子那里看扳鱼。由于我们算是“常客”，又都是孩子，个子比较矮，所以大人们都把靠前面一点的位置让我们，但也会看着我们，不让我们站得太靠前，以免脚下一滑掉进河里。俗话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那天一网子上来了好几条大鱼，我们几个非常高兴，又是蹦又是跳的，其中的一个小伙伴一个不留神，滑了一跤就掉进了河里。当时大人们都刚好在帮忙起渔网，我们几个小孩又都不会游泳，所以掉下河的小伙伴很快就往河的下游漂了过去，我们站在那里被吓呆了，河边的大人一边帮忙喊着救人，一边让我们赶紧回家去把大人叫来。于是我们一路狂奔回家找大人去帮忙，可是巷子里的大人基本都上班去了，爷爷奶奶们听了我们的话，也顾不上打骂我们，赶紧往护城河边跑去。

当我们到护城河边的时候，落水的小伙伴

已经被人救了上来，而救他上来的正是我们巷口磨刀的哑巴。他是担心我们会出事，所以从我们溜出来被他撞见的时候就一直跟着我们？还是看到我们跑回去喊大人的时候那火急火燎的样子，知道可能出事了所以比其他人先一步赶了过来？由于他不会说话，我们也不得而知。但是从那一次之后，哑巴在我们小孩子的眼里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住在破庙里的磨刀人，而是一个大英雄了。

童年很美好，也很短暂。眨眼间我就到了该上学的年龄，跟着父母搬出了巷子，住到了新建的小区里，对童年的记忆也就慢慢地淡忘了。直到有一天，在学校发的一本教材里，看到了小时候住的那条巷子的照片，上面写着“九刀庙巷”，而小时候我们经常在里面玩耍的小破庙，就是传说中供奉着关羽等人的九把刀的“九刀庙”。于是原本已经模糊的记忆又渐渐清晰起来，而哑巴在巷口低着头磨刀的样子又如昨日重现一般浮在眼前。哑巴知不知道这个小破庙的历史，我并不清楚，也许他这样一个磨刀人，住在一个供奉着刀的庙里，应该也是一种机缘，所以他的手艺才会那么精湛，同时也保护了我们这些不懂事又喜欢到处去闯祸的小孩子们吧。



寻梦台儿庄  
追寻曾经的运河记忆



寻梦台儿庄  
撰文：木木

“岸柳河桥，要平分邗水二分明月；桨声灯影，岂独让秦淮十里清歌。”

这，就是台儿庄古城。

如果说周庄是怀旧，平遥是疗伤，丽江是艳遇，那台儿庄则是梦乡。她神秘而悠远，古朴而灵动，千百年来，静静地散发着古运河的幽香，向世人展示着那绚丽多姿、别具一格的风情。

清晨，是台儿庄最宁静、最悠闲的时刻，漫步在古运河畔，看氤氲的雾气从运河上泛起，在晨光中飘散。那流淌了千年的运河，此时安静平和，如一位刚从睡梦中苏醒的少女，薄薄的河雾是她缥缈的衣纱，弥漫着些许幽香。

漫步在古城的小巷内，一切都是梦境中熟悉的模样，古朴淳厚的民风带着些许世外桃源

般的感觉。那种温馨和归依感就像流淌了千年的古运河，让起伏的思绪变得缱绻和安然。踩在苔痕斑驳的青石古道上，听着古道旁的蜿蜒流水潺潺作响；手触古色古香的石桥、廊坊、墩柱，不见沧桑，心境澄澈；抬头目落城墙、屋宇、青瓦、楼檐……

渠水牵引着脚步，低摇慢晃。太阳升起来了，静静的水声，风声，被岁月侵蚀过的木门吱吱呀呀的开启声，脚步叩响青石路面的声响，报童沿街叫卖《申报》的童声，货郎摇着拨浪鼓穿街而过，还有小贩的吆喝“冰—糖—葫芦儿”……众多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如铮琮的和弦。

登上步云廊桥，躲避正午的骄阳。却无意





得知此桥取名“平步青云”之意，这其中似乎蕴藏着一段耐人寻味的故事。在桥边小坐，欣赏桥面上的石雕，看着游船穿桥而过，思绪万千。

三千里长河浩浩荡荡，数千年古道源远流长；五千年沧桑岁月，五千年雄浑浩荡。大汶口时期的土陶石镰，龙山文化的晒米土台，偃阳古城的刀光剑影，秦汉王朝的残砖碎瓦，见证着这片土地的悠久。运河避黄改道，南北漕运畅通，大运河成为南北交通大命脉。台儿庄因河而兴，成就了“天下第一庄”的辉煌。商贾云集，商号、店铺如雨后天春笋；渔火点点，河道舟楫如

梭，帆樯如林。

走到小巷尽头，发现千疮百孔的墙面，找到了课本中的记忆。当年就是在这片土地上，李宗仁将军带领中国军队在台儿庄城内外与侵华日军血战了数十个日日夜夜，取得了台儿庄大战的胜利。震惊中外的台儿庄大战，使这座古城“无土不沃血，无墙不饮弹”。此时，我仿佛看见中国军人挥舞大刀冲入敌阵、腰缠手榴弹扑向敌坦克，他们用血肉之躯筑起钢铁长城，捍卫民族尊严。台儿庄一战驰名海内外，台儿庄走向了世界。就像匈牙利著名战地摄影师罗伯



特·卡帕写到的“历史上作为转折点的小城的名字有很多，滑铁卢、葛底斯堡、凡尔登，今天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名字，台儿庄”。台儿庄，将永远铭刻在中华民族团结一致、共御外侮的爱国主义丰碑上。

夜晚的古城，更显活力。

桨声灯影，舟楫摇曳。纤夫的号子，酒家的叫卖，一河渔火，十里歌声，夜不罢市，街巷丝竹之声悠扬。随便转个身，触目之情景皆可入画。桥上桥下，左岸右岸，风景各异。大红灯笼高低错落，白墙灰瓦，霓虹璀璨。大运河水面倒

映着七彩的建筑，也倒映着台儿庄的古老文化。月色下，淡淡的雾气笼罩着整个水城，静静的水面更多了一份扑朔迷离。夜渐渐深了，游人也一一散去，古城亦褪去先前的纷繁与喧嚣，恢复它一如往日的静谧。

寻梦，就在台儿庄。



## 追寻曾经的运河记忆

撰文 / 图 王昌卫

我在台儿庄古运河边长大，河里穿行的船，河岸上栽种的柳，都是我记忆中抹不去的风景。当然，记忆中还有许许多多和运河有关的好吃的好玩的，都是运河给我的快乐、给予我的养分。带着对运河的感恩之情，我探访了两位运河边的手艺人孙茂印、王茂群师傅。我要用心记录下沿岸的风物，把这美好的运河记忆分享给关注运河、关注运河文化的人，也算是一种报答吧。

### 运河面塑最好玩

说起面塑的起源，源于日常生活。我国古代很多地方在民间流传着逢年过节庆喜时用面粉做“饽饽”、“枣花”、“月糕”、“面鱼”、“面羊”的风俗，这些面食一般是作为蕴含祝福意义的食品或者祭祀的供品。这些用面做的“果实花样”既好吃，又好看，还蕴含着求吉纳福的祝愿，深受人们喜爱。慢慢地也就出现专门的捏面人的师傅，用模子或者手捏成各种人物、动物摆到街市上，沿街叫卖，那些彩色的面人儿逐渐就成了专供欣赏的民间工艺。

面塑起源的具体年代已不可考证，现存最早的古面人，是出土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地区的唐代永徽四年（653年）的面制女俑头、男俑上半身像和面猪。到了宋代，捏面人已经成为民间节令很流行的习俗。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记载：“寒食前一日谓之炊熟，用面造枣锢，飞燕，柳条串之，插于门楣，谓之子推燕”，“以油面糖蜜造如笑靥儿，谓之果实花样”。

当时面点，有“甲冑”人物、“戏曲”人物、“孩儿鸟兽”、“飞燕形状”等，可谓“奇巧百端”。每逢节日、婚嫁、喜庆、祭祀等传统民俗活动到来之际，各种造型的面塑竞相秀场，增添了不少情趣。面塑俗称捏面人，通过造型夸张、生动，用色明快、大方，风格粗犷、朴实、简练，而且有着鲜明的民间和地方特色。

明清时期，面塑成为艺人们最重要的谋生手段。清代咸丰三年（1854年），山东菏泽穆李庄做泥塑的王清源、郭湘云等人采用染色的糯米粉捏面人（当地俗称“江米人”）销售，很受欢迎。光绪年间，天津出了一位“面人张”。他早年抄录戏曲，擅长校勘，人称“百本张”，捏面人的艺术精湛，可惜其技艺在晚年失传。

我们所熟悉的近现代面塑名家，以“面人汤”汤子博（1881—1971）、“面人曹”曹仪策、“面人郎”郎绍安（1910—）最著名。汤子博的面人生动传神，曹仪策的面人精细素雅，郎绍安的面人色彩浓重。故宫博物馆现在藏有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玩过的一些人物面塑，就是出自著名的面塑艺人汤子博三兄弟之手，至今仍然色彩鲜艳，技艺相当成熟。此外还有“粉人潘”潘树华以及其女婿“面人赵”赵阔明等人。

### 通过大运河传入台儿庄

历史上的台儿庄，水陆交通便利，是因河而兴的“水旱码头”。有几千家商铺，十几万流动人口。台儿庄运河面塑的兴起与运河漕运的发展密不可分，在泇河开挖之前，台儿庄只是名不

见经传的小村庄,随着运河漕运的兴起,台儿庄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兴起。由于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大量的船只滞留台儿庄,大量的外来人口聚集台儿庄,也使台儿庄的商贸出现大繁荣,特别是大量暂住商人、手艺人使台儿庄艺人也伴随着商贸应运而生。面人、糖人、砖刻、石刻脸谱、陶瓷彩绘都在这一时期在台儿庄应运而生。为什么叫运河面塑而不叫台儿庄面塑就是这个原因。

### 面塑技艺和内涵

面塑实际上就是“馍”,用糯米粉和面加彩后,用手指和小刀、小篦子、竹针等通过压、按、点等手法塑造出点、线、面等造型元素而形成的各种小型动物、植物、人物等形象的工艺品,制作步骤有四,分别为“一印、二捏、三镶、四滚”,缺一不可。面塑的核心技术是发面,只要掌握好发面技术,按照式样、步骤进行控制,那么一个鲜活的面塑形象就会脱颖而出。据说面塑最传神的部分是“文的胸、武的肚、老人的背脊、美女的腰”,这也是制作人最难把握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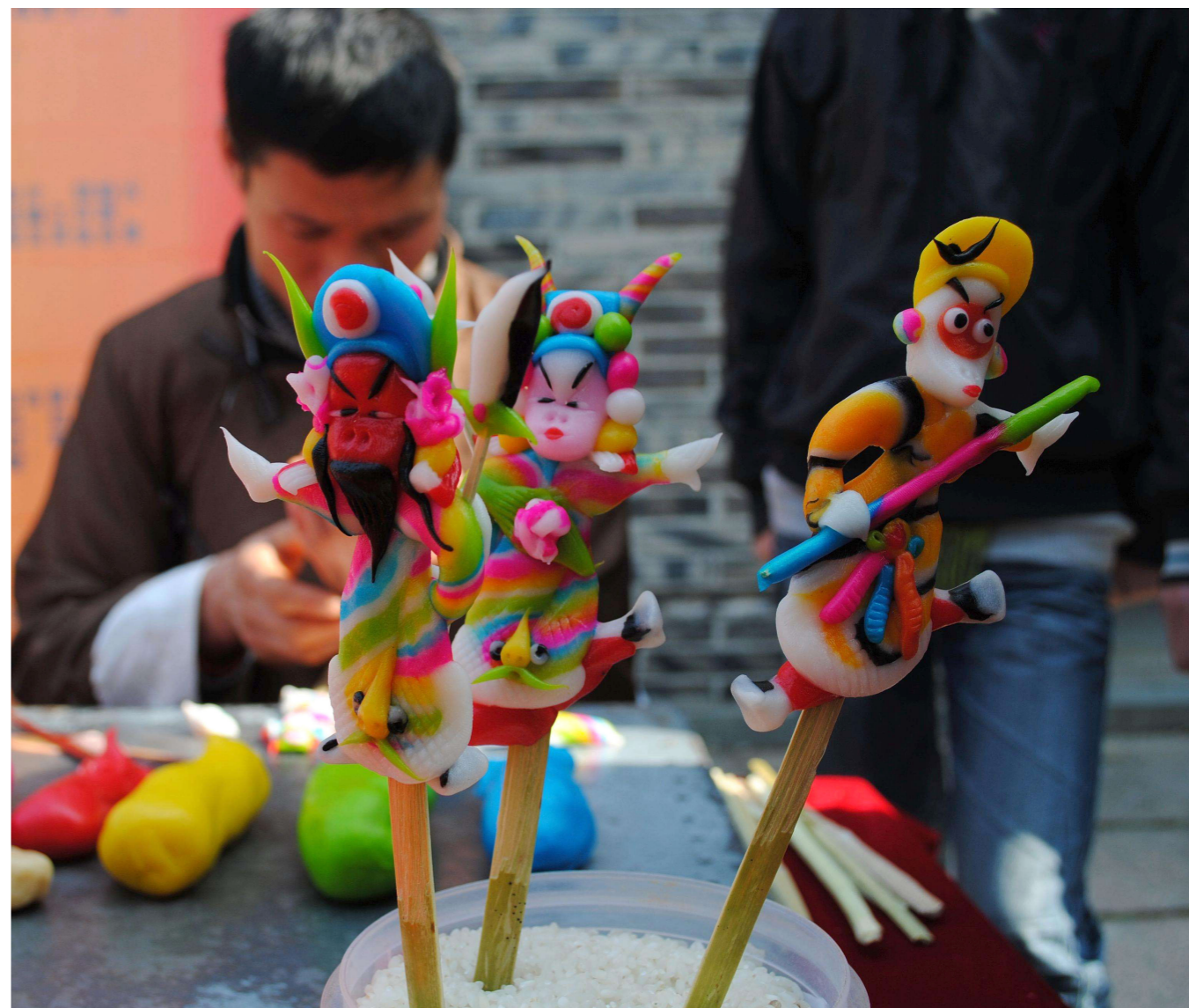
面塑的题材非常丰富,一般会因场合不同而不同。比如,春节来临前,捏制鸡、鸭、鱼、葡萄、石榴、茄子、佛手、满堂红等,以象征万事如意、多福多寿;在“寒食”节祭祖时,捏制“蛇盘盘”,祭祖时晚辈吃掉“蛇头”,表示“灭毒头、免灾祸”;婴儿满月时,由姥姥家捏制椭圆面圈上放置精美十二属相的面塑,即为“囫囵”,寓意孩子健康成长;老人寿辰时捏制寿桃,寓意老人

长寿等。除了以上题材外,面塑艺人还根据历史故事创造出《嫦娥奔月》《天女散花》《三打白骨精》《大闹天宫》《霸王别姬》等古装人物作品,正如老艺人所说:“天上飞的,地下跑的,什么都能做。”捏面人所用工具很简单,小竹片、小竹签、剪子、专用木梳等,这就是全部的行头。各种颜色的面团,一经艺人抹过蜡油的手,或揉、捏、掀、搓、挑,或压、按、拨等技法,就魔术般地被赋予了生命,栩栩如生,令人叹为观止。

### 繁荣和凋落

明末清初,是运河面塑的最繁荣时期,那时面塑艺人游走于街头巷尾,每当逢集逢会更是集会上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全国各地捏面艺人基本上来自山东,艺人肩挑小木箱,手提活动小凳,木箱的插架上插着塑制好的形态各异的面塑样品,箱内的彩面用潮湿的布盖着以保持湿度。面塑所用的面料以白面和糯米面(江米面)为主,用蜂蜜调成各种色彩面。每到人口密集地,艺人便将小木箱架好,坐在小凳上,将柔软的面团材料从中拿出来,便聚精会神地现场捏塑起来。围观者觉得好看好玩好喜欢,那就掏钱买下。面塑不只是起到一种玩具的功能,更重要的是面塑具有欣赏价值。运河面塑艺术造型、艳而不俗、色彩搭配协调,具有深厚运河文化底蕴,无不给人以美的享受。

直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因为时代的发展、新兴的多种玩具的出现,运河面塑渐渐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现在每当逢集逢会已经很难





再看到面塑艺人卖面塑了，运河面塑正渐渐从老一辈人记忆中淡化，当代年轻人很少知道面塑了。因为学习面塑需要心灵手巧，不是每个人都能学会，而且即使费时费力学会了，也很难产生经济效益，所以现在年轻人都不想学习，不愿学习面塑技艺。

### 运河面塑的传承

面塑的传承与很多其他民间艺术一样，一般采取口传身授传承，祖辈相传，师徒相传，而没有专门的学校机构去传播。传统的面塑艺人是“只为谋生故，含泪走四方”的街头艺人，很少有系统的知识，但是不可思议的是，面塑就是在这样的普通群众手中开出美丽的花朵。那应该是一种虔诚信仰和喜庆心情的结晶！如今的面塑艺人，我们称之为民间艺术家，他们的境况是怎样的呢？

2015年经过多方询问和走访，我来到台儿庄运河面塑传承人王茂群的家里，恰巧他正在制作面人。在他的工作室里，我们看到了小木箱、手提活动小凳、木箱的插架、批刀、塑刀、小剪刀、梳子、骨簪、花纹印章等制作面塑工具。现场王茂群制作了一只动物面塑，只见一团面在他的手里搓揉，用小竹签灵巧地刻画，三四分钟的时间一只栩栩如生的孔雀开屏的面塑展现在我们面前，不但让我们看到了他高超的技艺，而且还感受到了面塑强大的艺术魅力。面人的骨架多用一根小竹棍做成，用彩色的面团按压成片，往身上就势一裹，面人就有血有肉了。衣

服有短褂长袍，裙子的带子是用两三种颜色的面丝缠绕在一起做成的。做眉眼时先用黑色面团搓成细丝，然后用竹签切下一截分别按在眉眼的位置上，之后用红色的面团搓成细丝，用竹签挑一点按到嘴的位置上，就成了红唇。头上的金钗、花朵和其他饰品，用不同颜色的面团组合搭配制成，再用竹签将其按在头部适当的位置上，最后在竹棍下做一个硬纸托，可以平稳地站立住。

王茂群说：“造型生动、细致传神，是运河面塑的主要特征。”运河面塑有八仙过海人物系列、西游记人物系列、吉祥物、花草虫鱼。运河面塑，素材广泛、雅俗共赏：面塑多取材于动物、花草、人物、吉祥物及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及历史典故等艺术含量较高的面塑，深受各界欢迎。

王茂群在20余年的卖艺生涯中，他的足迹遍布鲁南、苏浙及周边等地区，他捏的面塑常常一气呵成、艳而不俗，出手快，着色富丽而不失典雅，通俗而不媚俗。因其面塑技艺独特、塑功扎实，赢得群众的喜爱，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目前，运河面塑和全国各地面塑工艺一样，面临着传承乏人、市场低迷等危机。现在跟王茂群学习面塑的两个徒弟已经因为难学，更因为不挣钱，也转行了。虽然为了保护，台儿庄文化部门采取了多种保护措施，但是由于缺乏资金投入等问题，运河面塑的传承仍然步履维艰。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身份证。如今从事此类专业的手艺人已不多见了，面塑这种民间工艺品竟然不知不觉，从人们视线中

逐渐消失了。现在的年轻人连什么是面人或许都不知道了。

### 运河面塑明天更美好

随着台儿庄古城的重建，按照“大战故地、运河古城、江北水乡、时尚生活”的定位，遵循“存古、复古、创古”的理念，用民俗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来充实台儿庄古城内涵已经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台儿庄古城也采取一系列优惠措施吸引艺人们的入驻，现在国家对非物质遗产传承人越来越重视，运河面塑也被列入枣庄第四批非物质项目名录之中。王茂群每逢节假日会到台儿庄古城向游客展示面塑，引起游客们广泛关注。自从2012年起台儿庄区人民政府每年都举行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大会，至今已经成功举办四届。台儿庄区文化馆正逐步对非遗传承人生活现状进行统计上报，争取上级有关部门加大对传承人的扶持力度，相信通过国家扶持和传承人个人的努力，运河面塑技艺一定能永远地传承下去，永不消失，永远受到台儿庄人民的喜爱。

### 运河陈氏糖画最好吃

糖画，顾名思义，就是以糖做成的画，它亦糖亦画，可观可食，民间俗称“倒糖人儿”、“倒糖饼儿”或“糖灯影儿”。分为平面糖画与立体糖画两种。它是地道的民间画种，颇具特色的街市艺术，广泛流传于巴山蜀水，大江南北，运河两岸之间，是备受情侣，大、中、小学生的喜爱的

工艺食品。

陈伟生于糖画世家，自七八岁开始就随父辈学习糖画技艺，父亲从小对他要求严格，陈伟从学校放学，别的小朋友做完作业能出去玩，可是陈伟还得跟父亲学习制作糖画，到目前为止已有18年整。陈伟大专毕业后放弃了去单位工作的机会主动制作糖画，出售糖画，靠糖画生活。他曾经在国内大中城市表演糖画制作及销售糖画作品，后来受到台儿庄古城的邀请又回到古城。陈伟说，他的祖辈是南方人，后来随着台儿庄运河段的开通祖辈通过船流动，最后在台儿庄这个地方定居。以前古城没重建，祖辈们只能靠逢集逢会，溜乡卖艺，挣得钱虽然不多，但祖辈不辞艰苦，最终没让这个糖画手艺失传。运河陈氏糖画现目前主要分布在台儿庄古城和运河两岸。陈伟希望运河糖画能把中国古文化糖画制作手工技艺发扬光大。

运河陈氏糖画，是以冰糖为材料，制作以勺子为“笔”，糖稀为“墨”，各种生动的图案造型在艺人手下跃然纸上。运河陈氏糖画的题材有戏曲人物、吉祥花果、飞禽走兽、文字等，以人物和动物的造型最为有趣。若是侧面的形象，便以线造型；若是正面的形象，则用糖料将其头部堆成浮雕状。由于糖料的流动性，即使相同的形象，亦不出现雷同的造型。民间艺人在长期实践中掌握了糖料的特性，同时根据操作的特点，在造型上多施以饱满、匀称的线条，从而形成了独有的风格样式，给人以美的享受。陈伟介绍说：糖画是民间小技艺，现在是枣庄市非



物质文化遗产了。糖画,相传它是在明“糖丞相”制作技艺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的。所用的工具仅一勺一铲,糖料一般是红、白糖加上少许饴糖放在炉子上用文火熬制,熬到可以牵丝时即可以用来浇铸造型了。在绘制造型时,用小汤勺舀起溶化了的糖汁,在石板上飞快地来回浇铸,画出造型。陈氏糖画是他的祖辈在清中期的时候偶然间学会的,代代相传,流传到他这一辈,已经是第七代了!很久之前其祖辈们是在船上沿着运河做生意的,后来就固定在台儿庄这里。现在糖画的材料经过了改良,主要是由麦芽糖、蜂蜜和果酱熬制而成,具有润肺化痰的功效,小朋友们喜爱的同时,家长们也能更放心。其实做糖画很辛苦,除了要掌握好熬糖技巧、画糖的功底,还要承受风吹日晒还有下雨天的潮湿糖会化的弊端。有时候熬糖的温度高,糖液四溅会把手臂、手背烫伤。说到这,陈伟伸出手臂,我看到了他手上曾被糖液溅伤过的疤痕。陈伟说:“我曾一度想要放弃制作糖画,但想到小朋友们看到糖画脸上流露出来的喜悦,还有80后甚至年龄更大的朋友们说的‘童年’,我还是很开心继承了这门手艺。为了适应时代的发展,我进行了创新,制作了喜洋洋、灰太狼、阿童木、光头强、熊大、熊二等系列卡通人物糖画。前一段时间,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

记吴邦国来古城观看了我的糖画表演,对我的糖画表演竖起来大拇指,并说年轻人干这个很不错……临走还和我握了握手。我想,在全国这么多糖画艺人中,我是幸运的,这更加坚定了我把这门手艺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的信心。现在国家有相关政策,古城领导又很关心,我们运河陈氏糖画现在已经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还要继续申报省级的、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在糖画技术上,我要紧跟时代的步伐,绘制出更多精美的图案,在发展上要克服糖画本身的易化易碎的弊端,要把糖画这门手艺保护起来,更要发展起来。”

听了陈伟的一席话,我仿佛看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糖画的传承、发展和未来。🍬

王昌卫,80后,枣庄市作家协会会员,笔名白面书生,多篇作品散见于《乡镇论坛》《文化快报》《齐鲁晚报》《枣庄日报》等国家和省市级报刊杂志。



治河与藏书  
——道咸之际的南河总督杨以增  
《荷使初访中国记》所见清代运河风情考述  
连接南北水网的「过塘行」



## 治河与藏书

——道咸之际的南河总督杨以增

撰文\王云

**【摘要】**海源阁主人杨以增以藏书大家闻名遐尔。同时他又是一个沉浮官场几十年的朝廷要员，在任江南河道总督期间，他的宦途和藏书事业都达到了顶峰。本文蒐集正史、方志、实录、笔记、杨以增奏疏及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杨以增传包资料，对杨以增主政南河时期的活动做一综合考述。以期能够弥补对杨以增和海源阁研究的薄弱环节。

**【关键词】**杨以增 江南河道总督 清江浦 藏书

杨以增(1787——1855)字益之，号至堂，亦名东樵。清东昌府聊城人。幼年丧母，由其祖母抚养成人，勤奋好读，博览群书，长于经学，于名物、象数、音韵、训诂皆入门径，尤雅好藏书，筑“海源阁”度藏海内珍籍二十余万卷。道光二年(1822)中进士，历任贵州荔波、贵筑知县，遵义、贵阳知府，广西左江道，湖北安襄郢荆道，湖北按察使，河南开归陈许道，甘肃按察使，甘肃布政使、陕西布政使、陕西巡抚。道光二十八年(1848)就任江南河道总督。咸丰五年(1855)底年卒于清江浦，时年69岁。谥号“端勤”。杨以增一生喜读书，爱收藏，以藏书大

家闻名遐尔。同时他又是一个沉浮官场几十年的朝廷要员，在任江南河道总督期间，他的宦途和藏书都达到了顶峰。本文蒐集正史、方志、实录、奏疏、笔记及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杨以增传包资料，对杨以增主政南河时期的活动做一综合考述，以就教于方家。

### 一、履难蹈险赴南河

公元1194年，黄河在河南阳武决口南侵入淮。黄河携带大量泥沙使清口以下淮河干道逐渐淤积，并在淮河中下游结合处造就了洪道型湖泊——洪泽湖。元明清定都北京，每年需



从江南调运数百万石漕粮经京杭运河北上。黄河在淮安与运河、淮河交汇,使得这一带成为险要之地。至清代,黄河对淮河下游的侵淤日益严重,形势更为复杂,南河成为清政府的重点整治地区。为此,清政府专设江南河道总督,驻扎清江浦,重点治理南河。

河道总督始创于明成化年间(简称河督或总河),首任总河是工部侍郎王恕,驻扎山东济宁,负责黄河与运河全程的修防事宜。清因明制,设河道总督为治理河道的最高长官,“顺治初,设河道总督一人,驻扎济宁,综理黄运两河事务。”此后,随着黄、淮、运纠结侵淤的日益严重,淮安的重要性日益凸现,康熙十六年(1677),河道总督衙门由济宁迁移至江南清江浦(今江苏淮安市),反映出清朝政府对黄运交汇之地的重视,所谓“河工自康熙中即趋重南河”。雍正时分总河为三:一为江南河道总督,管理江苏、安徽两省的黄、淮、运道。简称南河,驻清江浦。二为河东河道总督,管理山东、河南的黄河与运河,简称东河,驻济宁。三为直隶河道总督,管理海河水系及运河,简称北河,驻天津。“自是,北河、南河、东河为三督”,共同“掌治河渠,以时疏浚堤防,综其政令,营制视漕督”,一般为正二品官。河督以下河道管理机构分为三级:道、厅、汛分段管理,并设有文职、武职两系统。厅与地方的府、州同级,设同知、通判,汛同县级,设县聘、主簿等。

在三河督中,江南河道总督管理江苏、安徽两省的淮河、运河与黄河河道,总督衙门所驻的

清江浦是淮河、黄河和运河三河的交汇处。清代,黄河决口次数频繁,河水倒灌容易使得运河淤垫严重,从而给漕运造成很大的困难。需要不断地堵黄、疏运,河工工程异常繁重。因而南河总督责任重大,朝廷多任命能臣或满蒙要员担当此任,如尹继善、白钟山、刘统勋、麟庆、萨载等。

黄河自南宋夺淮南流,至清朝道、咸之际已有700多年,入海口被黄沙淤垫严重,下游之水渲泄不畅,又造成河床升高成为地上河,因而一到汛期,常常溃决,人称:“塞于南难保不溃于北,塞于北难保又溃于上,塞于今岁难保不溃于来岁”,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即便大禹再世,也无能为力。黄河南行不畅,改道北徙已成大势所趋。道光末年,黄河下游决口频仍,一发不可收拾,尤其是道光二十二年、二十三年祥符、东牟之决,正河断流,黄淮间一片巨浸,历时多年始得堵决,更为有清以来所罕见。

自鸦片战争失败后,清廷的内忧外患日益加剧,列强环伺,庞大的军费开支和战争赔款,使朝廷本已入不敷出的财政更是雪上加霜。为了解决财政危机,清政府除了增加田赋、盐课之外,还迫不得已削减了必要的开支。其中,主要是用于生产性支出的河工费与塘工费比重急剧下降。鸦片战争前,每年河工费用常在三四百万,逢黄河决口,则高达七八百万。河臣又多以河工为“肥差”,可以贪冒钱粮中饱私囊,故覬覦钻营以求其职者不乏其人。道光中后期,河患更甚,决口更加频繁。“河患至道光朝而愈

亟,南河为漕运所累,愈治愈坏。”而政府的治河经费却不断减少,不管有无决口,每年只以300万两为限。一旦治河不力,漕运受阻,皇上震怒,还要受到摊赔、罚奉、革职乃至充军等处分,南河总督之职也由“抢手”变为“烫手”,人人视为畏途,惟恐避之不及。

河工本是治理河道、防止水患的工程,明清两朝又特指治理黄河、运河的工程和事务。由于京师对江南漕粮的依赖,如何保证运河不受黄河侵害成为河工关键。清初,河工已有岁修、抢修、另察、专察、奏办、咨办等名目,运河工程还有冬挑例工等,并各有经费。久之,河工成为贪污的渊藪,嘉庆以后尤甚,贪污的手段是多种多样,基本上从工程和料价上下手,如虚报工程量、增加河工料价等。因此,清廷每年拨出的大量治河经费,多被河员贪污中饱,结果钱花了无数,水害反而愈烈,病民也愈甚。正如魏源所说:“黄河无事,岁修数百万,有事塞决千百万,无一岁不虞河患,无一岁不筹河费,此前代所无也。”河工成了清政府财政的漏洞和病民扰民的弊政,朝廷上下皆知其弊却乏鼎革良策。

正是在河费日削、河政日坏、河臣多被世人诟病的局势下,道光二十八年,年过花甲的杨以增被从署理陕甘总督任上调为江南河道总督。接到任命后,杨以增的幕僚及同年好友均知河事糜烂难以为治,劝他借故辞官,回故乡养老。而杨以增本性朴厚疏阔,非恋栈之人,他常自言:“古人曰归耕吾不能矣,若著毡冠,披羊皮裘,课乡里小童经书,吾诚乐之!”对于河政弊端

与治河之难,杨以增都十分清楚,但他自幼熟读圣贤之书,儒家修齐治平和忠君保民观念早已渗透到骨子里,明知河事难为却依然慨然赴任,他说:(河事败坏)“吾知稔矣。徒以受皇上特达恩,以县令超擢至此,欲决去诚不忍于心。”面对这个出力不讨好的苦差事,杨以增没有选择逃避,于同年九月走马上任。

道光皇帝之所以选中杨以增担任南河总督,究其原因不外乎两点:一是因为嘉庆以后河费减少、河督责重事繁,一遇决口,还要按律“销六赔四”摊赔河工款,许多高官视治河为畏途,(前任南河总督泮锡恩任职六年,治河劳心,以病辞任)朝廷干才难求。杨以增自入仕途以来,官声颇佳,林则徐曾推荐他接替自己为陕西巡抚,称其“诚正清勤,明敏练达,实为臣所不能及”,为人处世,宽厚稳重,“恢恢乎如河岳之无涯,量鲸虾之巨绝,犀象之珍怪,无不容纳于其间。自县令至封疆,守正无阿,而一无齟齬, … 无私利心,能推利于人而不害其事也。”在当时的官场中,杨以增不失为循吏和能臣。二是杨以增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任河南开归陈许道期间,河南祥符黄河溃决,他奉命参与修堵,“听夕莅工次,风涛冲击,身屹立不少避”,“在事出力”,历数月才竣工。由此,杨以增积累了一定的治河经验,道光帝有“杨某熟谙河务”之评语。

杨以增自入仕二十多年以来,多在边远省份任职,远离家乡,难以尽孝。南河总督位高权重,驻节清江,距故乡山东东昌不过千里之遥,



重新修复后的海源阁

凭借运河一帆可航。更何况杨氏“一专于书”，雅好收藏，清江地近江南藏书中心，文人墨客云集，开府于此有近水楼台之便，对于他所钟情的藏书事业有益无害。这或许应是杨以增愿意赴艰履险又不便明言的一个隐衷。

## 二、力矫河工之弊

杨以增到任时，河政积弊已深，河道管理机构繁冗。南河总督驻清江浦，文武厅员星罗棋布。官员的麇集，使这里成为了征歌逐舞的宴乐之地，“饮食衣服，车马珍玩，莫不极四方之巧”，官员大多贪图在清江浦的侈糜生活，不肯到各地守职。据当时的两江总督李星沅的调查显示，南河四道（淮海道、常镇道、徐州道、淮扬道）管辖同知通判 23 员，旧例应常年驻守各地，随时实力修防。但“近年来，惟徐州、常镇道暑十厅照旧分驻工次。至淮扬道属七厅、淮海道属六厅，率多聚处清江，厅属几同虚设。非遇盛涨抢险，皆不到工。因而实任佐杂各官营汛，视堤防如传舍，即奏防汛候补人员，亦多安坐寓中，并不亲往帮办，殊非慎重要工之道。且清江人稠地隘，风气虚浮，厅员本有司职，乃若一无所事，游戏征逐，耗费实重……”对此，道光帝深恶痛绝，喻令：“此等恶习相沿已久，甚属可恨。杨以增甫经莅位，无所用其回护，务失公忠，务顾嫌怨，力加振作，悉除旧习，务期涣然一心，庶于吏治河防两有裨益。”将整顿“恶习”的希望寄予杨以增。又派钦差大臣巡视江南，“…面晤河臣杨以增，令其裁汰冗员。据称黄运两

河二十三厅内，惟常镇道属扬运通判，工程较简应归并江防厅，改为江运同知。有丹阳县丞、灵璧主簿、吕梁巡检三缺一并裁撤。”

杨以增到任伊始，就严令寄居清江浦的员弁各归工次，不准在清江逗留。又奉上谕“严行查禁，务令各守本汛，实力修防，不得稍有旷离，致滋贻误。”不久，他上奏说：“履任以来，明察暗访，每于接见询以河湖之关键帚坝之机宜，聆其言论，留心观看。”掌握了所属道厅官员的才干优劣，针对当时人浮于事，许多官吏不谙河工，玩忽职守的情况，杨以增参奏朝廷，将才能欠佳而又居于要缺的扬河通判孙沛、险工抢修之时擅离职守、私回清江浦的高堰营守备薛瑶、年愈 70 耳聋眼花的海阜厅县丞胡廷埒，才本平庸、名声狼籍的铜沛厅南岸主簿赵信让等一批冗员革职查办。还尊旨将工程较简的常镇道扬运通判归并江防厅，改为江运同知，将丹阳县丞、灵璧主簿、吕梁巡检三缺一并裁撤。对此，道光帝嘉谕称：“甚属认真，嗣后若能常川如是，方合功令森严，尽心职守，朕甚嘉焉。”冗员的革省，即节省了河员薪俸，又对众多河官起到振聋发聩、以儆效尤的作用。

道光年间，河工之弊已经积重难返，河臣贪污，上下分肥，骄奢淫逸，酒色征歌已蔚成风气。河员的豪奢侈糜，可比皇室、权臣，“清江浦上下十里，街市繁华，食货丰富，五方聚集。行则车马喧嚣，居则高楼精舍。食则宾客盈门，山珍海味。游则青楼歌馆，通宵达旦，不知千百家。”杨以增并没有随波逐流，而是尽力矫除积

弊，力崇节俭，率下以廉，革除旧习，使清江浦的风气为之一变，得到皇帝奖喻。与此同时，杨以增又从核实河工物料入手，缩减浮费。清代治河，河料费用玄虚，是河员贪污的重要手段，如堵河用秸秆一项，国家拨款按垛收购于民间，按律每垛五万斤，报销官银 200 两，实际上只给百姓三四两，虚报了五六倍以供各级河官分肥。胥吏在收料后，又往往虚堆假垛，中空如屋，三不抵一。据清人杂说：“道光二十一年林文忠公（则徐）曾在济宁任东河总督，深知个中虚弊，他奏言：‘秸秆乃河工第一弊端。其门垛、滩垛、并垛诸名目非抽拨拆现，难知底里。遂将南北十五厅各垛，逐查有弊者究治……岁省度支无算。’”杨以增与林则徐同声相求，为平生挚友，又有长于经世之学、熟谙河务的包世臣为其幕僚，故杨以增对于河事积弊十分清楚。为了杜绝下级文武官吏的冒领钱粮，节省费用，他经常亲自到黄河岸边核查垛料，“每至一斤，除点数查量外，均挨工抽拆数垛”，检查是否有“虚松夹杂之弊”。经过一番整治，河工有了一些新的气象，吏治有所改善，河费有所节俭。道光二十九年，所用经费“比较道光二十六年少用银 77 万两，比较二十七年少用银 60 万两。”“故有余以为后图。”他还奉旨携所属道、厅员弁，检查河堤培修情况，“如有虚壤铲堤等弊，据实参赔。倘有老幼妇女偷抽料柴，亦即严拿惩办。”

杨以增力戒浮华，尽心筹划，虽不能改变河政日坏的大局，但他的努力，既尽到了一个朝廷重臣的职责，也为灾难深重的清江百姓减轻了



一些负担，在当时已属难能可贵。

### 三、堵黄治运，保漕安民

南河总督的主要职责便是治理黄淮河道，保证运河畅通，漕粮北上不受阻碍，这在清末是一副十分沉重的担子。杨以增身在其任，力谋其政，在任江南河道总督的七年中，他为堵黄治运竭尽了全力。

道光二十八（1848）年夏，在杨以增赴任前，黄河水势大涨，当时的两江总督李星沅命人开坝向洪泽湖泄水，由于河高湖低，河水一泄难收，致使运道水浅舟涩，漕船行进迟缓。杨以增到任后，皇帝命他接办此事，以确保漕舟如期过淮北上。杨以增率领属下文武吏员，指挥河兵和民工疏浚河道，于慎重中务求妥速之法，终于不误漕期，安稳度过汛期。道光二十九年入夏

以后，阴雨连绵，河湖皆涨大水，运道危急，况拦河堤外万亩稻田秋熟在望。若只保漕河，开坝放水，农民半年心血就要付诸黄流，若一味保稻田，万一黄河决口，冲毁运道，泛滥成灾，则损失更大。杨以增既想保运道，又不忍伤民生，心急如焚，左右为难，他一面将危急情势写成奏折上奏朝廷，一面坚守在外南厅吴城七堡险峻堤段，“督率道将、厅营等，催运料物，鼓励兵夫奋力抢办”，但天意难违，“连日又复长水尺余，河溜益猛，随厢随走，赶用碎石抛压，亦仍冲失。竭三昼夜之力，黄水日长日高，大堤愈塌愈窄，有仅存顶宽一二尺者，实属危险异常。”无奈之下，杨以增与淮扬道查文经、淮安知府王梦龄及幕僚们反复商讨斟酌，权其害而取其轻，决定从以前洪泽湖泄清水刷黄河的旧地段，挑堤泄洪，此处河面高出湖面七尺多，在此宣泄不伤一家一口，

损失最小。到“六月二十八亥刻，溜势愈形紧急，日前存堤顶一二尺者顷刻塌尽，仅存底坡，瞬将过水”，便动工破堤，将黄河之水宣泄入洪泽湖，一夜之间即使黄河水位降低了四五尺，上下游险峻堤段都得保全，七堡溃堤之段得以放手抢修，清江淮安各处人心俱定。因挑堤泄洪之举并未来得及与漕运总督商议，也未得朝廷明示，故杨以增赶紧上奏章说明此是“于万分危迫之中为择害取轻之计，事出仓猝，不及先期奏明”，并详细绘图据实恭折上奏。得到了皇帝的谅解，降旨称“杨以增抢办险工泄黄减涨并绘图呈览……本年黄水积涨，南河吴城七堡堤段坍塌，危险异常，今该河督将大王庙旁泄清旧址挑通宣放，旋即消水四五尺，各工俱报平稳，七堡溃堤抢筑亦能得手。事属危急，自系从权办理”。危急时刻虽然过去了，但由于泄黄河沙淤积，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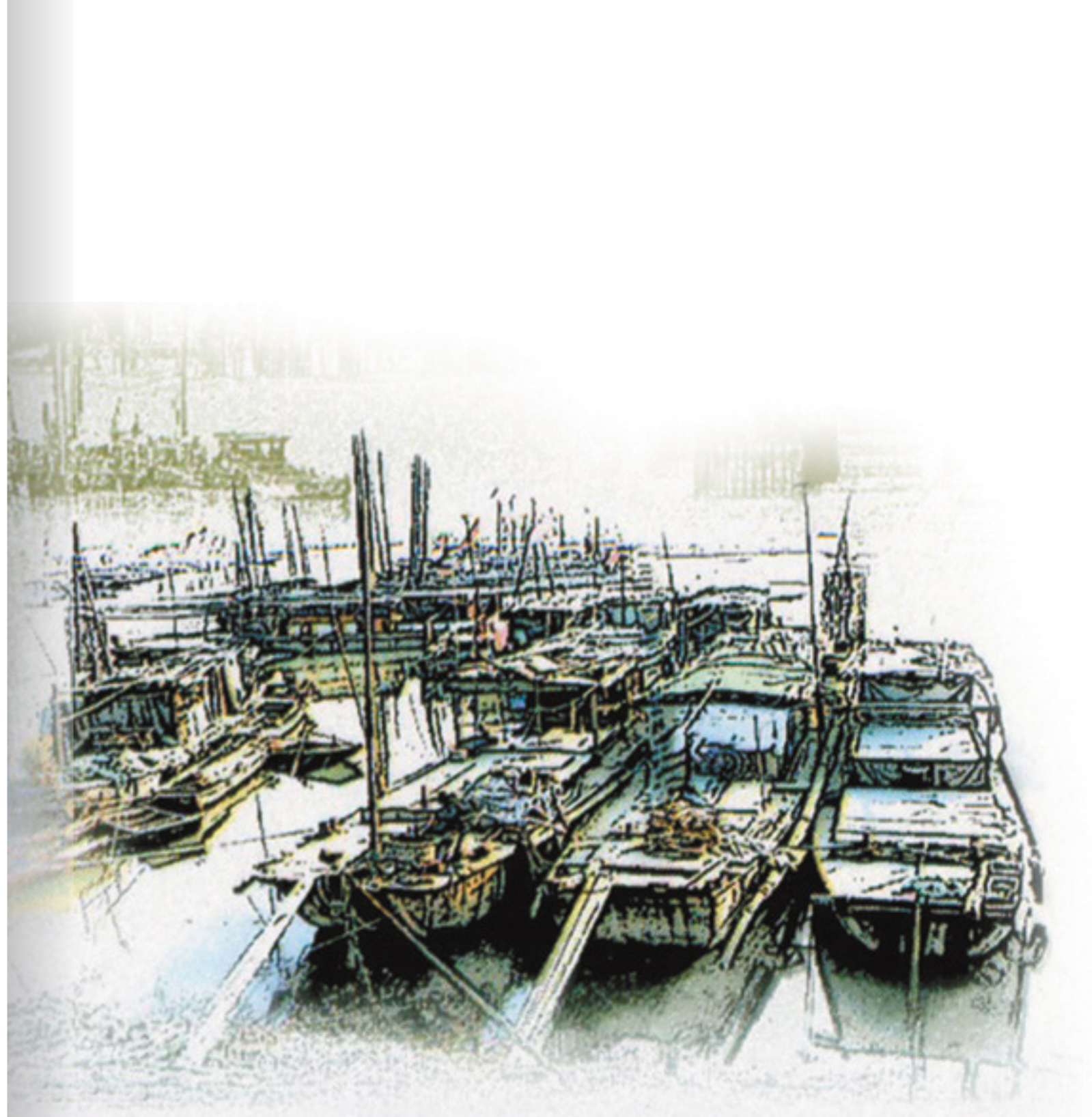
安至高邮段运河河道臃堵不畅，故使北上漕船行驶迟缓，比往年晚了近一个月，因此招致了漕运总督张殿邦的不满，他上奏朝廷，参革南河总督杨以增以惩其误漕之罪。而吴城七堡泄洪后，道、厅河员敷衍塞责，坍塌河堤并未堵拢，致使黄水冲灌运河，河床继续淤堵。道光帝于当年十一月下旨，斥“杨以增督办不力，著摘去顶戴，下部严议。”不久因杨以增、陆建瀛和杨殿邦合力摧攒，漕船终于按期过淮，不误来年新漕兑运，便又赏还顶戴，改为降四级留用，继续堵塞泄黄决口。直到九月份，河湖工程才竣工合拢。杨以增的处分亦随之开销。

道光三十年（1850）四月，黄河来源甚旺，漫滩淤堤，洪泽湖也盛涨异常。杨以增与两江总督陆建瀛一起“通筹河湖大局，奏请次第办理”。督促各道、厅及营弁，设法抢护黄河与洪泽湖之间的大堤，他亲往勘察江、扬两厅西堤工程，发现间有碎石单薄，土工亦有不实之处，便将承办各工之员一律革职赔修，严督改过，终于保证“各工悉臻平稳”。同时，漕运总督杨殿邦因前次泄黄淤运而对杨以增心存芥蒂，他先参奏杨以增手下的外南同知娄晋办理灌塘之事草率，将其暂行革职。而陆建瀛、杨以增则联名奏称娄晋未经手灌塘事宜，不应处分。漕臣与督臣、河臣之言互相抵牾，受到皇上斥责。后经钦差大臣福济查明，杨殿邦之奏是“以己忘公”。下旨处分，交吏部议处，令其自新。由此，二杨之间更难相处。七月杨殿邦又奏“淮扬运河水浅，漕船均需起剥……”，而后经杨以增查

明，该处毫无浅阻，运河一律通深。只因江西各帮船行至瓜州，为日已迟，要求漕臣提前赶灌二塘，杨殿邦没有答应，因而漕船“较多守候”迟迟不行。杨殿邦推卸责任于杨以增，可见当时漕督、河督各有轸域，难以和衷共济，为此，杨以增、杨殿邦、陆建瀛均受到皇帝申饬。反映了清朝的纲纪衰弛与官场人际关系的紧张。

咸丰元年（1850）是清王朝的多事之秋。是年，太平军起义于南，黄河水决肆于北，丰县北部的河堤被暴涨的河水冲决，杨以增接讯“驰抵丰北，查明漫口情形，奏言口门塌宽至一百八十五丈，水深三四尺”。这次决口非同一般，大溜竟然掣动正河断流，分作数股在苏北、鲁南、豫东一带横溢。皇帝以杨以增身任河督未能事先预防为由，命“摘去顶戴，交部议处”。至次年四月，由于钱粮支绌等原因，丰北决口迟迟不能堵绝，杨以增被革职留任效力河工。此时，他已65岁高龄，仍以戴罪之身同两江总督陆建瀛一起，率河员民工挖土培堤，甚至在除夕之夜，风餐露宿河上。一切用度都自掏腰包，不费属吏官钱。下属们都深为感佩，实心用事，贪冒敛迹。

在黄河漫流运道不畅的情况下，朝中有人建言漕粮改行海运，杨以增也与陆建瀛一起联名上奏折，请行海运，得到允准。这年海船将100万石漕粮运至京，此后漕粮海运渐成主流，黄河与运河的修治便拖延下来。咸丰二年底，丰工决口已界堵合，可是寒冬到来，雪冻土僵，堤坝无法施工，功败垂成，上下怨尤。因为清廷



正在全力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军费激增，而河工费日渐紧削，捉襟见肘，丰工决口已经一年半多，迟迟没能合龙，受淹地区的官员百姓深以为苦，朝廷内外众口煽惑。大多数人认为是河工经费过于节省，无奈之下杨以增上章要求增拨河款，结果朝廷财政入不敷出，无款可拨，反而要杨“惟有坚持定见认真妥办。此巨工首重核实，朕知卿等断不为浮言所惑，益当不必嫌怨，慎重为之，以苏民困……”。可见杨以增已经倾尽其能，从国家大局出发，克勤克俭，但经费不足，使他“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丰北决口仍不能堵合。杨以增只有上疏请求推延期限并自请治罪，他第二次受到革职留任的处分，并被责成按律承担赔修工程款项。

咸丰二年秋，由广西金田起义的太平军已逼近长江，清政府命两江总督陆建瀛率兵到长江一线严加设防。杨以增在已经摊赔河款，几至家徒四壁的情况下，又想方设法筹措白银一万两，捐作军需。区区万两，对于朝廷庞大的军费需求来说可谓杯水车薪。但杨以增于危难之时急大局所需的作为却十分难得，由此，他得朝廷嘉奖并赏戴花翎复职。在干戈蜂起、民心丧乱的局势下，杨以增坚持职守，全力治河，直至咸丰三年正月底，才将丰县决口挂揽合龙，黄河回归主道，运河也未受到明显淤塞。道光帝闻报欣喜异常，下旨曰：“杨以增经理得宜，不负委托，著加恩还给顶戴……交部优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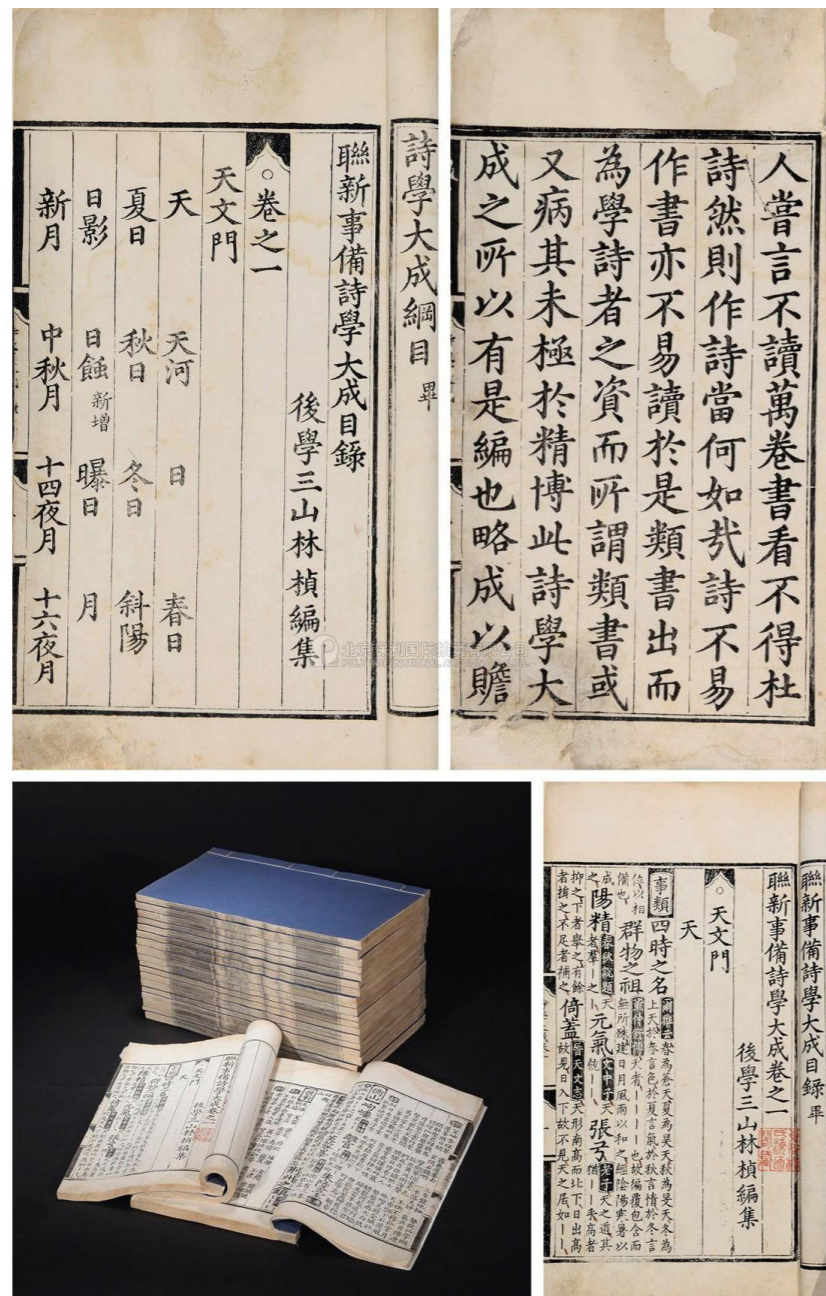
然而好景不长，六月黄河汛期来临，河水陡涨，丰工西坝再次坍塌。皇帝闻讯震怒，认为新

筑的堤坝，数月而坏，其中必有弊端。杨以增再次遭到夺职处罚，留本任赎罪。这次革职摘顶，杨以增深自咎责，以为罪行不轻，可能会遭贬斥戍边，便开始收拾行装，所备衣物细软只敷日用，唯将珍藏之书装满几箱，准备携书上路。但道光帝也深知，丰工堤坝合而复决，是时势所成，责任并不全在督河之臣，故命杨以增仍留南河，戴罪效力，继续主持堵合丰工决口。

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攻克金陵，镇江、扬州也相继被攻占，淮安危在旦夕，杨以增在河事繁剧之时，又被飭命督防江北。而此时，河款河兵均已被挪作军用。杨以增无钱又无兵，无奈之下，只好奏明朝廷，自筹钱粮，自募兵勇，亲加训练，运筹布划。清江浦扼南北门户，又无山险可凭依，河湖交错，一片平衍，难以扼守。杨以增费尽心机，运筹帷幄，反守为攻，主动指挥兵勇攻打扬州，并声言要决洪泽湖水浇灌太平军的军营，使其不敢擅攻清江，保清淮一带免遭兵燹，百姓们在三五年间得以安居。

咸丰五年（1855）太平天国运动已席卷大半个中国，清王朝遭受着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更无暇顾及黄河工程。丰北决口愈冲愈宽，堵不胜堵。终于在六月汛期到来之际，在河南铜瓦厢发生了数百年来罕见的大溃决。洪水淹没五府二十余州县，主流向西北由张秋穿运河，夺大清河道入海。由此，黄河结束了700多年的东南夺淮入海的历史，而作为朝廷南北运输大动脉的京杭运河也被拦腰截断，河水被黄水裹挟东去，无法全线通航，运河漕运迅速衰败。





海源阁藏书“元林楨辑 联新事 备诗学大成三十卷”

这场人力不可逆转的大变故，使身为河督的杨以增更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即要保境安民，又要修治恣意荡漾的河道，河防军务并集一时，艰险万状，回天无力，终于积劳成疾，咸丰五年十二月十八，老病交加的杨以增卒于任上。临终时，仍“以塞河未成自悼叹”，“犹筹度其事未已也”。

此时的咸丰帝正被国将不国的危局搅得焦头烂额，又惊悸于黄河大改道造成的涝灾，对于死于国事的杨以增，虽然深表痛惜，却没有给予应有的恩荣，只下诏以军营病故例给以抚恤。直到十二年之后的同治八年（1868）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以后，应两江总督马新贻及众官之吁请，才给杨以增“端勤”的谥号，并赏以“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督御史”衔。

#### 四、倾力搜求江南珍籍

杨以增任南河总督七年间，虽公事繁剧，难有闲暇，但他喜好读书，尤嗜藏书。政务之余，他并未随波逐流，像其他河臣一样逐酒征歌，趋膻嗜腥。而是洁身自好，“一专于书”。梅曾亮曾经在河督府为西席，授杨以增之子杨绍和古文辞。杨以增对他十分尊重，每天与他同案进食。据梅曾亮记载，杨以增常常在上午处理公事、接见宾客，事毕即手执一卷，或校勘，或诵读，晚饭后则常与三五好友研讨学问之事，可见对文化的专注贯穿了杨以增的一生。在清朝后期，杨以增以海内藏书大家名闻遐迩，正是在江南河道总督任，他的藏书事业达到了顶峰。海

源阁藏书的精华大多是这一时期收集到的。

杨以增在湖北任道员期间，便开始购藏书籍，所收以普通版本、精刻本为主，珍本甚少。道光十八年（1838）杨以增奔父丧归里，因藏书渐多，乃于道光二十年（1840）建藏书楼，题其名曰“海源阁”，且旁书跋语道：“先大夫欲立家庙未果，今于寝东先建此阁，以承祀事。取《学记》‘先河后海’语，颜曰‘海源’，盖寓追远之思，并仿鄞范氏‘天一’名阁云。”此后他历任道员、按察使、陕西布政使等职，继续收藏图书。所收书籍数量虽多，但珍本较少。其中为数不多的几部珍籍，也都是江浙旧藏流散于各地者。

杨以增出任江南河道总督后，其官署设于清江浦，这里是联接南北方的漕运中心，同时也是文人骚客汇聚之区，据清人李元庚等《河下园亭记》及其续编、补编记载，清江浦有名士们修建的园亭山庄百余处，均为“名流所居”，文化氛围非常浓厚。如官绅张新标筑建的依绿园中有一曲江楼，即为清初淮安著名的文学社团——望社的主要活动地点，张氏“尝大会海内名宿于此，萧山毛大可（奇龄）预其胜，赋《明河篇》，一夕传抄殆遍。”杨氏在此任职凡七年，遍结名流宿儒，收购江浙诸藏书家珍善本书甚多。

道光二十九年杨以增沿运河南下访求珍籍，在扬州汪容甫处购得宋本《毛诗训诂传》二十卷和宋巾箱本《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又继续南行至苏州，购得江南藏书名家季振宜、徐乾学藏宋淳熙三年张杻桐川郡斋刻八年耿秉重修本《史记》一百三十卷。又访获黄丕烈“陶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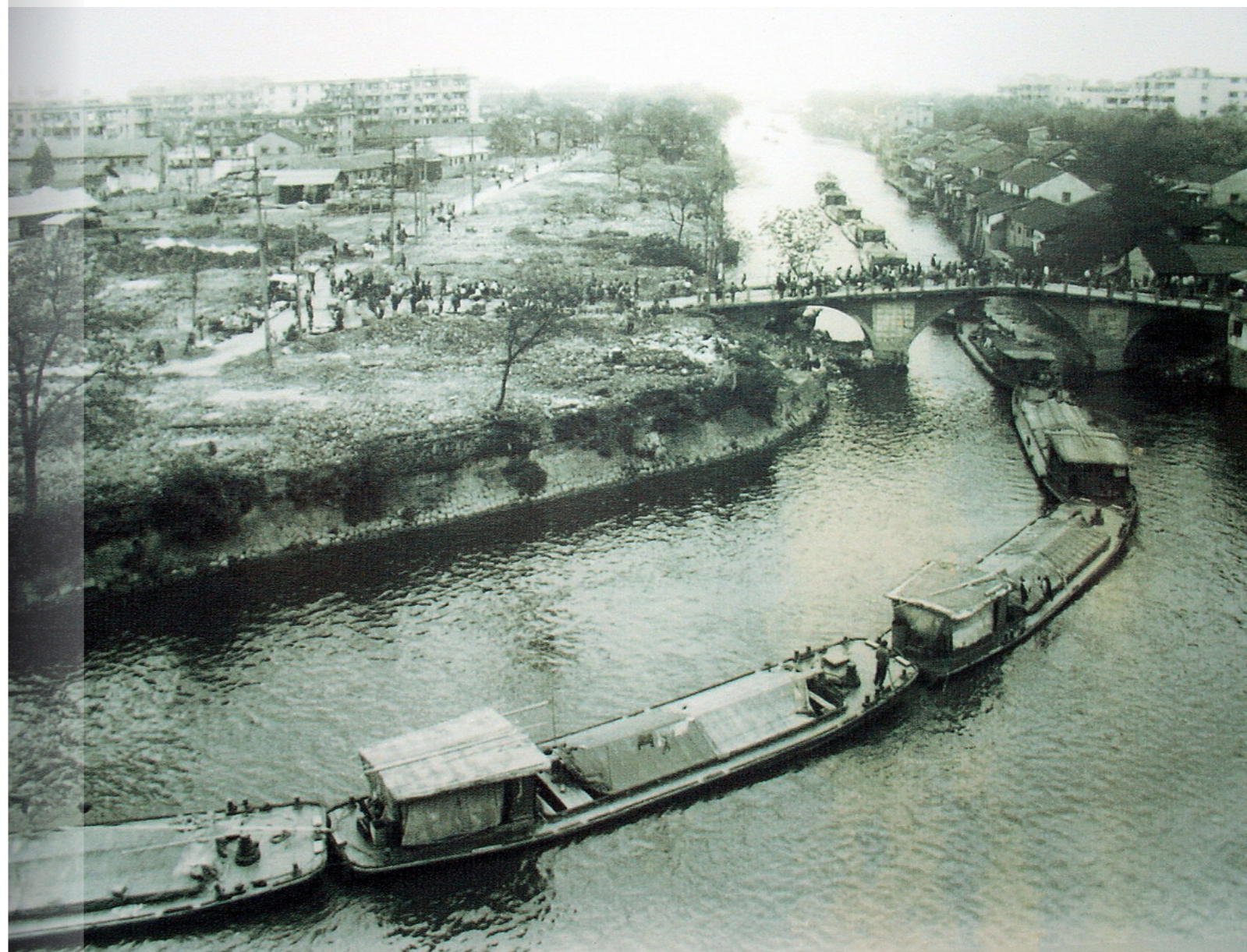
室”藏宋版《陶渊明集》十卷和《汤注陶靖节先生诗》四卷两种。这次南下访书收获巨大，将多种宋本珍籍搜括囊中。尤其是宋本《毛诗训诂传》二十卷和宋本《史记》一百三十卷，杨以增更是如获至宝，后将其与宋本《诗经》《尚书》《仪礼》《春秋》《两汉书》《三国志》合称“四经四史”，筑专室收藏，成为杨氏海源阁的镇阁之宝。

咸丰二年，杨以增再次南下苏州，访书购得毛晋、徐乾学、季沧苇、周良金诸名家收藏的宋王叔刊本《后汉书》一百二十卷。宋版书籍历来以存量少、篆刻精为世人所重，杨以增将这些辗转流离来之不易的典籍专辟“宋存书室”珍藏。

在道光二十八年（1848）至咸丰二年（1852）的4年中，杨以增于清江浦所收之书以汪士钟艺芸书舍所收黄丕烈旧藏为最多。明清时期，江浙多大藏书家，如山阴祁氏澹生堂、江阴李氏得月楼、常熟赵氏脉望馆、常熟毛氏汲古阁、宁波范氏天一阁、虞山钱氏绛云楼、金陵黄氏千顷堂、昆山徐氏传是楼、秀水朱氏曝书亭、钱唐吴氏瓶花斋，皆闻名于海内。其中绛云楼、传是楼、汲古阁等，乃海源阁藏珍秘本书之渊源。虞山钱谦益乃明季清初藏书大家，其绛云楼藏之富，“冠于东南，几埒内府”。后其楼遭火灾，藏书焚毁大半，乃以烬余转交族孙钱遵王。昆山徐乾学乃顾亭林之甥，清前期的学问大家，既富有资财，乃广求古籍，其书室名曰传是楼。康熙初年毛氏汲古阁书散出，徐乾学、季振宜得之最多。乾嘉之际，徐乾学、钱遵王之

书，由何焯介绍，半归北京怡府乐善堂，半归江苏吴县黄丕烈，而季振宜之书，时亦散出，为黄氏所得。故黄丕烈百宋一廛藏书甲于天下。黄丕烈死后，其书尽归汪士钟艺芸书舍。同时，汪氏又得顾氏小读书堆、袁氏五研楼、周氏水月亭之书，江浙藏书之精华，毕集于汪氏之家。道光、咸丰之交，其书陆续散佚，适值杨以增出任河道总督，杨氏凭近水楼台之优势，广为搜求，购获甚多。如《宋本史记》条下记曰：“先公于辛亥岁（按：咸丰元年，即1851年）以三百八十金购之吴门。原册已损敝，次年又得一是刻残帙，命绍和互校，以清晰考入之……付工整治，都为六函……癸丑冬载陶南别业。”

杨以增之子杨绍和所编海源阁藏书志《楹书隅录》的正编中，载海源阁之珍善本书共171部，其中大都钤有江浙著名藏书家的印章，钤有汪士钟印章者24部，有黄丕烈印章、题识者36部，有徐乾学印记者18部，另外季振宜、钱遵王、汲古阁毛氏之印章题跋亦时常可见，从中可以窥见海源阁藏江浙旧籍之来源。光绪年间进士、曾任湖南学政的江标观看海源阁藏秘本书后说：“吾郡黄蕘圃（丕烈）先生所藏书，晚年尽以归之汪闾源（士钟）观察。未几，平阳书库肩钥亦疏，在道光辛亥、壬子间（辛亥、壬子乃咸丰元年、二年，即1851、1852年）往往为聊城杨端勤公（杨以增谥号）所得……甲申（1884年）冬，复随先生（指汪郎亭）观书于阁中，端勤文孙凤阿舍人发示秘籍，举凡《艺芸书目》之所收，《楹书隅录》之所记，千牌万蕴，悉得寓目。大约



吾吴旧籍十居八九，菟翁（黄丕烈）所藏又八九中居其七焉。”

咸丰三年（1853年）至咸丰六年（1856年）的4年中，杨以增在清江浦继续收购因战乱而散出的江浙各地旧籍。咸丰三年春，太平天国起义军攻占南京并定都于此。清军则建立江南、江北大本营，包围南京。双方连年大战，战火燃至江浙一带，各家旧藏纷纷散出。当时清兵大部驻南京至扬州一带，他们乘战乱之机，掠夺珍藏古玩以出售。杨以增据守清江浦，地近江浙，且当南北水路交通要道，故购获甚多。其子杨绍和多述及此事。如《宋本新刊韵略》中记述道：“咸丰初，扬州始复，南北各军往来淮上，往往携古书珍玩求售。此本为但云湖使所得，云老转贻家简侯丈，简丈以之赠余者也。”江浙旧籍流入书贾之手者更多，他们知道杨以增嗜藏书，乃持书单登门洽谈，《楹书隅录》中不乏此类记载。

另外，杨以增身居高位，宦迹甚广，朋友故旧遍及各地，其中不乏学问大家，也有版本学专家。他们处处留心古籍，遇有珍秘之本，即为之购买。如梅曾亮、刘燕庭、许印林、叶东卿、胡珽等皆曾为之购买珍籍，远道寄赠。因比，杨以增除大量购获黄丕烈、汪士钟等名家藏书外，购获江浙其他各家藏书亦甚多，全国其他地区之珍籍，亦间有所获。清江浦的河道总督衙门到杨氏的老家东昌府之间有运河连接，每年络绎不绝的北上运粮船，更给杨以增提供了将获购珍籍源源不断运回海源阁的方便，故杨以增在江

南河道总督任上收购的江浙旧籍量多、质高，成为海源阁藏书的主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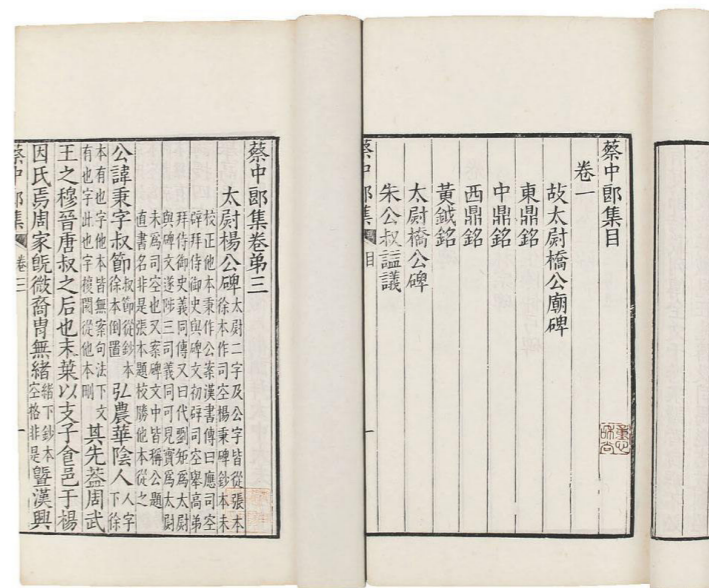
杨以增在清江浦的收书藏书活动在海源阁藏书史上是最为光辉的一章，在整个中国近代藏书史上也具有重要的地位。

## 五、余论

杨以增一生为官，卒于官任，又“一专于书”，苦心收藏。在仕途上，他官至封疆，位高权重，只可惜命运不济，遭逢乱世。在国事日下，河弊积深的情势下，杨以增以儒者的胸怀，以国家大局为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走马江淮，奉命治河，担当无人能够承担的重任，两遭革职，数次议处，虽竭尽能事，仍难挽颓局，以致心焦力瘁，以身殉职，成为清王朝国衰政颓的牺牲品。杨以增晚年的仕途凶险，正是封建王朝江河日下的反映，他在江南河道总督任的悲剧，也可视为中国末代王朝走向将灭亡的一个侧影。

至于杨以增的官品，有人认为，清代河臣无人不贪，杨以增久任河督，又花费巨资购求大量珍籍，恐怕也难以免俗。事实上，杨以增死后“宦囊萧然”，连皇帝都深为怜悯，“赐祭葬汝例”。

道光名臣包世臣曾说：清朝自康熙朝的靳辅以后没有能言治河者，最多只能谈谈防河。又说河臣“能知长河深浅宽窄者为上，能明钱粮者次之，重武职这又次之。”所谓明于钱粮者已经很难得，因为这样的河臣还能珍惜小民血汗。考察杨以增督河期间的所作所为，还算得上是



据海源阁仿宋本重刊本“蔡中郎集十卷外集四卷”

上等之臣。杨以增的同朝僚友也多认为他居官清廉。林则徐就曾说：“杨至堂乃圣贤门中人也。”“至堂守身如金城汤池，粟私不可攻至。”马新贻也称：“南河向称繁富之地，自该河臣莅任，力崇节俭，率下以廉，风气为之一变。”道光皇帝有“尽心职守，一洗旧习，朕甚嘉焉”之谕；咸丰帝亦有“卿能克勤克俭，亿万生灵蒙福”的赞语。他的幕僚好友，更是多赞其为“循吏”、“儒者”、“清白吏”等。由此可见，杨以增在当时贪污成风的官场，身处有“贪窟”之称的南河，并没有像大批河政官僚一样奢侈淫糜，也没有中饱私囊的劣行，能够尽职尽责，克己奉公。

即使退一步说，杨以增或许不能绝对清白（目前我们还未见到杨氏劣迹的相关记载），但

他把所有的积蓄除了赔修河工外，都节衣缩食，抢救性地购买大批因战乱而不保的珍贵的江南图籍，为保存中华民族文化命脉而倾其所有，为世人留下了海源阁这样一座文化宝库。正如有的学者所言：杨以增的搜购图书，不仅显示了一种文化良知，更重要的是，他的搜购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抢救，在干戈蜂起、风雨飘摇的清朝后期，让散落民间的残篇断简有了一个聊避风雨的归宿。他实际上是在为我们这个民族充当文化拾荒者。仅此，也应该得到世人对他的感念与尊重。📖

## 《荷使初访中国记》所见清代运河风情考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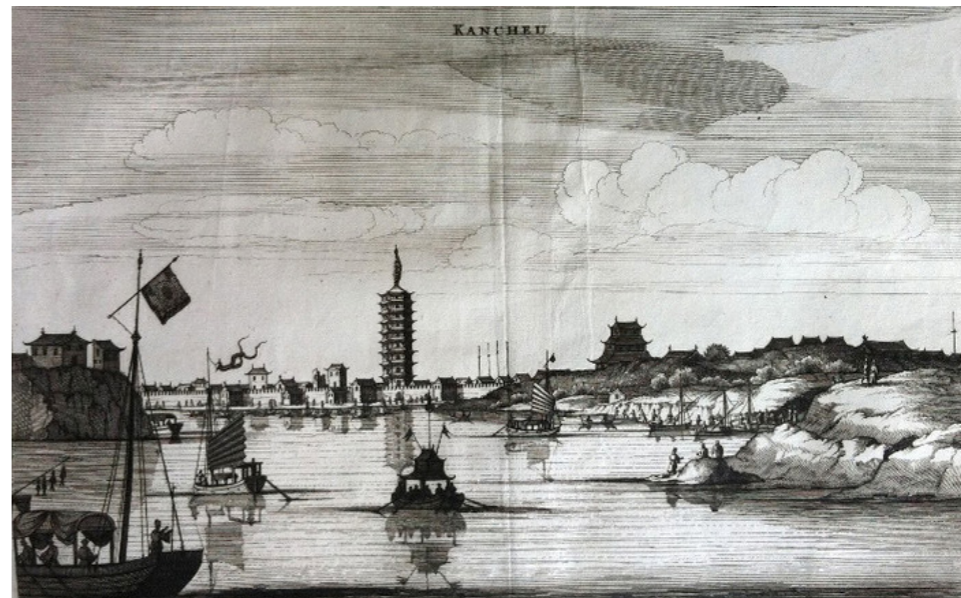
撰文 \ 胡梦飞(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

《荷使初访中国记》是荷兰人约翰·尼霍夫(1618-1672)所做的游记。约翰·尼霍夫(Joannem Nienhavinm),又译作约翰·纽霍夫,荷兰探险家。1618年出生于德国的伯爵领地本德海姆的余尔森市,早年做过水手,擅长诗歌、绘画和音乐,后来到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工作。约翰·尼霍夫于清顺治十二年(1655)随以彼得·候叶尔和雅克布·凯赛尔为首的荷兰使团来到中国,作为荷兰第一个访华使团的管事,对沿途所经之地的风景、地貌作了细致观察,对各地的河川、城墙、寺庙、宝塔和奇特的建筑物等都做了详细的记载,写下了《荷使初访中国记》这本书。1665年,阿姆斯特丹书商梅尔斯率先出版了尼霍夫中国游记的荷文和法文版,引起轰动。1672年,尼霍夫在马达加斯加岛探险时失踪。

约翰·尼霍夫在其《荷使初访中国记》中简要记载了清朝顺治十二年至十四年(1655—1657)间荷兰第一个访华使团的见闻,以其耳闻目睹提供了中国史籍所没有记载的材料。对所经过省份及运河沿岸的城市、乡村、政府、学



1665年出版的原版“荷使初访中国记”



赣州(纽霍夫画稿)



峡江(纽霍夫画稿)

术、工艺品、风俗、信仰、建筑、衣饰、船舶、山川、植物、动物、反抗鞑靼人的战争等方面都有精彩的描述，并配有在中国实地画下的 150 幅插图，对研究清初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及运河区域社会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由于约翰·尼霍夫沿途细致的描写和朴实的插图为西方世界提供了一幅真实的中国形象，以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荷使初访中国记》成为欧洲了解中国的重要知识来源。

## 一

荷兰使团进京的路线即是广州通北京的传统贡道。先是从广州到三水，然后溯北江而上，到南雄下船，再由地方官征集夫役，把所带礼物背过大庾岭。翻越大庾岭之后，到达江西省境。荷兰使团在南安府上船，沿赣江顺流而下，经吴城镇入鄱阳湖，再由鄱阳湖入长江。然后经长江北岸的仪征县到达扬州。荷兰使团于顺治十三年（1656）五月二十一日从扬州开始沿运河北上，途经扬州、高邮、宝应、淮安、宿迁、济宁、南旺、张秋、东昌、临清、武城、故城、德州、东光、沧州、青县、静海、天津、河西务、通州等众多运河城镇，七月十二日在张家湾下船，然后由陆路到达北京，故《荷使初访中国记》中对运河城镇风情的记载尤为详细。

清代苏北运河沿岸的扬州因运河流经此地，再加上地处南北交通要道，两淮盐商聚集，商品经济也很繁荣，“为东南一大都会”。顺治十三年（1656）五月二十一日，荷兰使团一行来

到扬州。《荷使初访中国记》记载：“该城位于运河左岸，距仪征六十里，呈四方形，建有高墙堡垒，方圆步行约三个小时，运河右岸有一片漂亮的郊区，商业也十分繁荣。…… 税关前面的运河上横跨着一座七艘船组成的浮桥，我们通过这座桥，再过三个城门才进入城内。城内所有街道都非常笔直，路面用砖头铺就。沿着进城道路的左侧郊区，矗立着一座六层宝塔。在上面可以俯瞰整个郊区。城西有一道小河，斜穿该城而过，河上有几座高大漂亮的石拱桥。”

荷兰使团还在扬州运河沿岸的邵伯镇看到了当地居民的端午节赛龙舟风俗。“这里的中国人正在庆祝他们的‘新月’节。我们看见这里有很多奇怪的船只，其中有两艘中国人称之为龙船的小艇正不断穿行，来往于其他船只之间，以博得众人的高兴。上面所说的小艇用桨划动，船身就像长满青草活动着的水蛇。船尾有奇怪的杠竿，上面钉着宽铁片和束旌，铁片上系着色彩缤纷的一束束丝带，这些丝带婀娜多姿地摆动着。船尾的拱起之处吊着一个少年，在水面和水里玩着各种把戏。”

《荷使初访中国记》对宝应、淮安、清江浦等苏北运河沿岸城镇的发展情况也做了较为详细的记载：“同日（五月二十六日），我们还经过宝应县。该城位于运河右岸，距高邮州八十里，以前曾是个繁荣的大城，我们从许多破旧并被战火毁坏的精美的房舍，尚可看出当年的风采。城北的城墙外有一座异教的庙宇，其外观内部都相当漂亮。这条皇家运河流到此处笔直得犹

如一束光线，有几个地方还建有水闸，可以引水灌溉，从而保持稻田的肥沃。”淮安作为明清漕运总督驻地，江南各省漕粮均在此盘验，大量漕船和商船在此聚集，“秋夏之交，西南数省粮艘衔尾入境，皆停泊于城西运河，以待盘验，车挽往来，百货山列，河督开府清江浦，文武厅营星罗棋布，俨然一省会”。《荷使初访中国记》记载：“当天（五月二十六日）我们到达淮安。该城位于运河右岸的一片平坦的沼泽地上，距离宝应县一百二十里，有一道城墙横贯该城，并建有坚固的城楼。郊区人烟稠密，房舍美观，延伸有三荷里。”淮安清江浦原为清河码头至山阳淮城之间的运河名，后在附近形成集镇，因运河流经，商品经济也极为繁荣，由于明清两代在此设立清江船厂等机构，清江浦的造船业较为发达。《荷使初访中国记》记载淮安清江浦镇：“这个镇分布在河两岸，房舍美观，宝塔壮丽，位于运河和黄河的连接之处，方圆有一华里。该城商业发达，居民富裕，还有很多船坞，制造各种船只出售。”

## 二

运河的流经也使得山东运河沿线兴起了济宁、张秋、临清、德州等城镇。这些城镇在运河及漕运的刺激下，大多商业发达，人口众多。《荷使初访中国记》描述运河沿岸的济宁：“这个城房舍叠栉邻比，并有二座高塔。河两岸的郊区一望无际，人烟稠密。此处还有两道大水闸，闸

水时水深达六尺。所有的客栈和茶馆都拥有自己的戏旦来取悦观众，顾客只需付六七文日本钱就可坐着整天看戏。而这么富有情趣、衣着华丽的男女戏子竟也能依靠客人所给的如此微薄的钱生活，真是不可思议。”

荷兰使团在济宁见到了渔民用鸬鹚捕鱼场面，认为是一种了不起的发明。《荷使初访中国记》中写道：“他们有一种两边都架着竹竿的小船，用桨划动，上述的鸟就停歇在竹竿上。他们把小船划到湖里，把那些鸟放出，那些鸟就立刻潜到水里寻鱼。而中国的船夫们则继续划桨前行，而这些鸟就以同等速度跟着船游动寻鱼。这些鸟的喙囊用圆环勒住，以防它们捕到鱼后囫囵吞下。而这些鸬鹚在水里一叼到鱼，就立刻浮出水面，先把鱼咽到喙囊里，飞到船上，渔夫就使劲掰开它的嘴巴，从喙囊里熟练地掏出那条鱼来。如果鸬鹚不再潜入水中捕更多的鱼，中国渔夫就用棍子或竹板将他们的鸬鹚打得羽毛横飞，这真是一种莫名其妙的事情。”

张秋镇，历史上曾称安平镇、景德镇，位于济宁和临清之间，为南北及东西交通枢纽。《荷使初访中国记》记载：“六月十九日，使臣阁下来到张秋城。此地距济宁一百六十里，位于皇家运河两岸。该城入口处两旁都建有坚固的防护城楼。城区为正方形，方圆步行约一个小时，有土墙和石造城垛。城里有很多漂亮的房屋，但因人口稀少，大部分房子没人住，而且非常颓坏。城中心靠岸边的地方有一座寺庙叫大王庙，



南康（纽霍夫画稿）



南安（今大余，纽霍夫画稿）

非常漂亮。”

临清地处江北大运河中段，会通河和卫河在此交汇，为南来北往漕船必经之地，“每届漕运时期，帆樯如林，百货山积”。《荷使初访中国记》记载：“六月二十日，二位使臣在著名的城市临清停泊。该城距东昌城一百二十里，座落在皇家运河的两岸，有两座城堡互相守卫着，河心还建有二个坚固的水闸。城北有一座由九条渡船搭成的浮桥，人们可以经浮桥来往于河两岸的城区。我们还在这里看到河两岸各有一门小铁炮，设置的位置很恰当。该城位于一片沙质的地面上，建有土质城墙，城里有许多漂亮的房舍和庙宇。城墙上有一个石造的城楼，北门城墙有十五个岗楼，二个圆堡。该城的布局呈不等边三角形，城区的幅员步行约一个半小时。我们在此地买到许多罕见的水果，其中有个大味美的梨，这种梨可以存放很久。从该城北门向北京方向航行，约半个小时后，可看见靠河之处有一座异教的庙宇，里面有很多奇异的东西。在庙里最后的殿中，有一尊三十尺高的女偶像，塑造得很精巧，装扮也很华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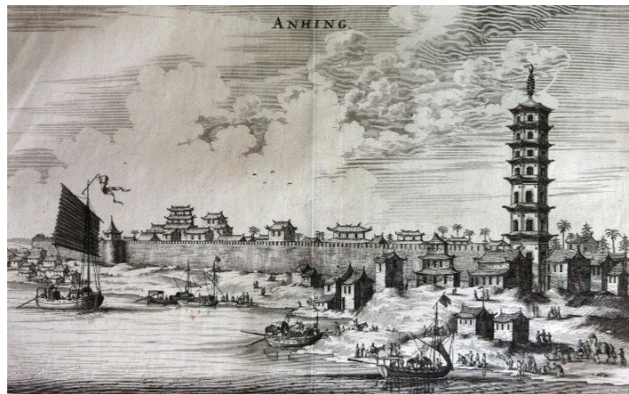
德州位于黄河下游，山东省的西北部，黄河和京杭大运河穿境而过，自古就有“九达天衢，神京门户”之称。运河全线贯通后，德州成为水陆交通要道，商品经济逐渐繁荣。六月二十八日，荷兰使团到达德州。《荷使初访中国记》描述了他们眼中的德州：“该城距故城县七十里，城区呈四方形，位于上述河流的右岸，城墙高大漂亮，上面有很多垛堞和圆堡。城郊人口众多，

商业繁盛。此地停泊着很多戎克船和其他各种船只，我们费了很大力气才得以通过。鞑靼人常常在此处买酒，因为当地汉人所酿的酒较外地酒好，价格便宜，味道醇美，储久不坏。”

### 三

除苏北、山东运河城镇外，约翰·尼霍夫对直隶境内的沧州、天津、通州等运河城镇亦做了描述。沧州位于河北省东部，北邻天津，南依山东，京杭大运河纵贯全境，自古就是重要的水旱码头和商贾云集中心。七月二日，使团一行抵达沧州。《荷使初访中国记》记载沧州：“该城离东光二百二十里，位于该河右岸稍向内陆的地方。该城有几个大郊区，分布在河流两岸，人烟非常稠密。但我们在此没有看到多少富裕的中国人。我们向东行，穿过五座牌坊，来到一堵高墙前，沿台阶而上，爬上墙想看看城内的情况。但在鞑靼人所建的这堵高墙上，无法看到城中心的内墙。”

天津自元代开始成为漕粮海运的重要码头，明清时期更是漕粮转运的重要枢纽和必经之地。天津南运河畔三岔河口地区，更因是南北物资交流的枢纽地带，从而成为繁华的商贸集散地。《荷使初访中国记》记载：“七月四日，我们在著名的城市天津城前抛次锚泊船，以便在那里过夜，并准备以后的行程。该城距静海县一百二十里，城区呈四方形，比巴达维亚城稍大些，有一道二十五尺高的城墙。城墙上有很多垛堞，垛堞后的通道宽达八步，但没有炮台。郊区



吉安（纽霍夫画稿）

非常大，从城区向四面八方呈放射形展开，建有漂亮的房舍。我们在这里看到前往高丽、日本和其他地方的戎克船和其他大船，这些船舶给这个城市带来了生意兴隆的盛名。城市附近还有空旷的沼泽地，在多雨的冬天里，地上大多积水。有几条河流在此处汇合，形成一个三叉交汇处，城堡就建在这个三叉交汇处。”

通州位于京杭大运河北端，明清两朝中央政府不但在通州设重兵守护粮仓，而且设置仓场侍郎、坐粮厅、通惠河郎中等官员负责疏浚河道、修筑闸坝、催攒漕船、收支税粮等事务。康熙《通州志》记载通州：“上拱京阙，下控天津”，“舟车辐辏，冠盖交驰，实畿辅之襟喉，水陆之要会也。”七月十七日，使团抵达通州：“该城距张家湾三十五里。位于一处低洼而又崎岖不平的地方，在通向北京的大路右侧，却又在运河的左岸。该城防卫严密，城中心有一道城墙横贯而过，但没有铺石的街道。我们离开通州城，沿途

经过几处房舍美观、商业繁荣的乡镇。……沿途的田野令人赏心悦目，一路上拥挤着来往于北京的人群。”同日，荷兰使团经通州由陆路抵达北京郊区，历时 57 天的运河行程宣告结束。

明清时期的京杭大运河是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在促进沿线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便利了人员的往来，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些外国使节、传教士、旅行者等多取道于此，运河沿线的水利设施、城镇乡村和风土民情，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关运河风情的记载在他们的作品中也多有体现。《荷使初访中国记》对运河沿岸城镇的名胜古迹、风土民情等做了大量的记载和描述，对清初战乱对运河沿岸城镇的破坏，亦有一定的涉及，给我们留下了有关清朝初年京杭大运河最直观而生动的印象，为我们观察和研究京杭大运河提供了新的史料和视角。

胡梦飞，(1985 年—)，男，山东临沂人，历史学博士，聊城大学运河研究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明清史和运河文化史。

## 连接南北水网的“过塘行”

撰文 \ 龚玉和

什么是“过塘行”呢？

杭州人将大江的堤坝称之为“大塘”，换句话说，也就是货物翻过堤坝，进入内河地区，由此产生的，中转物流行业称之为过塘行。

民国时期，杭州的一家报纸对过塘行业业务作过这样的描述：“过塘行，为浙江的一种特种行业，也许可说是转运的副业。杭州市内做这门营生的人不少，起初时，人们对装载货物，不知怎样装运，所以寻觅适当熟悉的人，为他们租些房屋与堆栈，照料货物的装卸，以及客户短期住宿之地。同时，客户也给些酬劳。后来，官厅因为这些人有代客买卖一类的事，方才征取牙税。至此，过塘已经成为一种纳税营业的行业。清和关这个地方，原本只是武林门外一个小市镇，但是那里的人十之有八九直接或间接靠过塘行为生，过去有二家较大的过塘行，行名叫章廷楷和昌永年号，每年所过货物多达一百万件，在这个行业吃饭的人有三四十个之多。后来，因为交通发达，收入也就少了。现在的几家，衰败得很。”

从上述记载中不难窥探到，旧时的过塘行，实际上是做货物转运、转口时的照料工作，诸如，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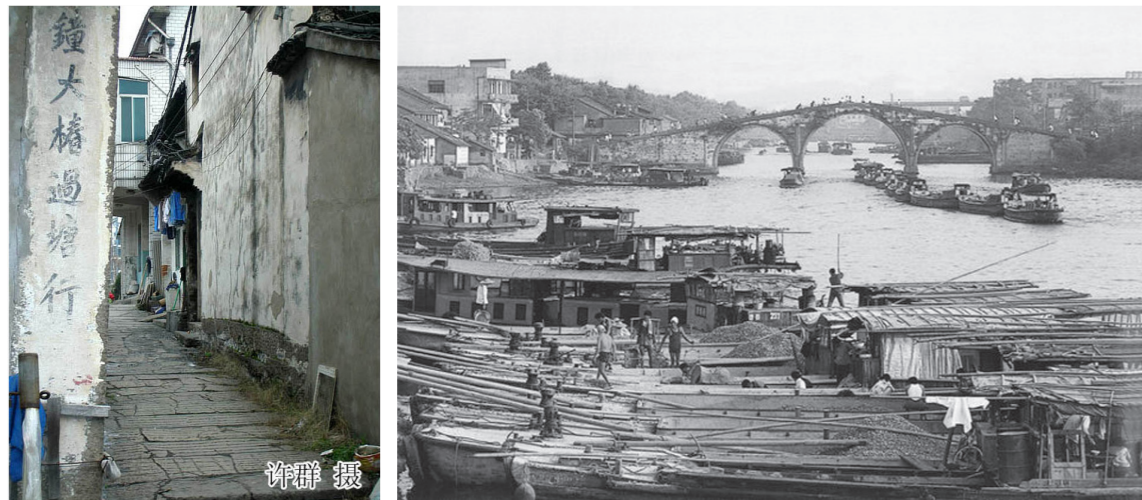
何装卸，如何仓储管理，或照料客人的临时落脚等等，甚或，也做一些客户的短期住宿之类的事。

想来，后来随着陆上交通（火车、汽车）的兴旺发达，作者也不由哀叹道：“过塘”（水运）这个行业已经衰落了！

据《杭州江干志》载：“据民国十七年（1928）杭州市政府《市政月刊》，全市有过塘行 125 家，均设在今江干区境内，过塘行多数以业主姓氏命名，以承运土产杂货、农副产品和转运京广洋货为主。抗战时陆运（铁路、公路运输）停顿，水运也趋于萧条，转运业衰落，战后恢复。解放初期，境内共有 140 家过塘行、转运行，约占杭州全市总数的一半。此后，客商托运货物，由铁路、公路、航运等国企承运，过塘行渐被淘汰。”

### 南北交通主干线上的“过塘业”

在浙江，过塘业最繁兴的地方莫过于钱塘江流域的二个埠头，一个是连接大运河与钱塘江二条全国交通大动脉的枢纽之地，拱宸桥（时称“拱埠”）至钱塘江边的闸口（南星桥码头）；另一个过塘行业兴盛之地，便是杭州钱塘江对



岸萧山(今滨江区)的西兴镇了。由大运河或钱塘江过来的货物,到了杭州,如要转运到浙东各地,那么就要跨江到对岸的西兴,然后经内陆河道转往绍兴、宁波一带,由此造成了这二个码头过塘行业的兴旺发达。

浙江还有一个过塘行繁荣昌盛之地,那就是钱塘江上游的江山港清河码头了,这里是连接福建浦城的仙霞古道起始点。在那二个码头一带(清河码头与浦城码头),形成了许多类似于物流公司的行业过塘行。

今天,我们在钱塘江沿岸的一些老埠头附近,诸如杭州滨江区的西兴镇上,仍能找到“过塘行”字样的踪迹。

### 钱塘江两头的“过塘行”

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以前,我国的陆上运输(公路、铁路)尚未兴起,南北交通大多依赖水运。由此,北方的大量物资经京杭运河到了杭州,过塘转钱塘江航运线路,上溯至钱塘江另一头江山港清河码头,翻越“仙霞岭古道”,运往福

建、广东等南方各省,形成了一条贯通我国南北交通的主动脉。

由此,在大运河与钱塘江交接之地(杭州的拱埠与闸口南星桥码头),在钱塘江的江山清河码头与福建的浦城之间,形成了一种兴盛过塘行。

杭州城北的拱宸桥(时称“拱埠”),为京杭大运河的终点。当时杭州城区的南、北各有二个埠头,南埠是南星桥,北埠则是拱宸桥,均处于水陆交通要冲,商品集散,人员往来,客商云集,各种酒肆、茶坊、店铺、旅馆、饭馆等应运而生,尤其是过塘行业特别兴盛。

拱宸桥,为京杭大运河的终点,由大运河南来的物资在此上岸。

由于大量南来北往物资的转运,以及杭嘉湖平原商品的集散,形成了当地浓厚的商业氛围,过塘行业的兴繁也带动了当地其它各行各业的发展。十里湖墅,店铺林立,娱乐业兴旺发达,人来车往,熙熙攘攘,好不热闹,时有“小上海”之称。

虽说从运河边的拱埠到钱塘江的南星桥码头只有十多公里路程,但是河道舟行艰难,钱塘

江与内河的水位落差过大,全靠牛拉肩扛,不仅成本昂贵,而且费时、费工、费力,成为南北交通运输之瓶颈。运河边艮山门的那尊雕塑,就充分反映了当年货物从运河“过塘”至钱塘江之艰苦卓绝。

转运物资的艰困给南北运输构成了极大障碍,也催生了过塘行业的兴盛。尤其是南埠的南星桥一带(闸口),由于过塘行业的发达,人称“十里江塘”,转运业的竹木及各种南北货物集散于此。

于是,各种过塘行相继崛起,候潮门外成为过塘行集中之地,与北边的拱埠遥相呼应,当时南星桥埠头有“浙江第一码头”之称。

### 江山港的过塘行业

浙江省的另一个过塘业发达之地,便是浙

赣闽交界之处的江山港了。当年从江山港的清湖码头沿水路而行,顺风顺水,只需3-7天就可以到达杭州。

如果由杭州的南星桥码头逆水上行,也只需要7-9天可抵达江山了。自南宋建都临安以后,江山素有“闽行者自此舍舟而陆,浙行者自此舍陆而舟”之称。

由福建到浙江的客货,到浦城后由陆路翻越仙霞岭,在江山清河码头改陆路为水路,继续扬帆北上。由此,清湖码头沿岸帆樯如织,商贾云集,行馆甚多,成为南北水陆交通之要会,特殊的地理环境,形成了过塘行业的异常繁荣。

清《江山县志》写道:“顺治十二年(1655):浙省驿站,惟衢郡为首冲,衢属驿站惟清河为最苦,陆行者至清湖而舟,舟行者至清湖而登陆,



出入闽浙,用夫动以数千,用船工动以数万。自清湖登舟,直抵省城,计程十站,实有万苦难支者。此江山知县,所谓一县而当十一县之差,一邑而代七邑之过也。”

### 浦城码头的过塘行业

浦城,处于仙霞古道的南端,紧靠南浦溪(为闽江上游)。商客在此将货物再次卸下,装上船舶,沿南浦溪(闽江),顺流而下,直至福州。浦城码头是仙霞古道南端的转运站。据《浦城县志》记载:“城关码头长达1.5公里的河道,两岸均建有埠头,常年停有船舶一二百只。”清代诗人施闰章有《过岭(仙霞岭)行》诗,曰:

“前有驿吏过,万里起埃尘;去时若流水,来时若连云。”

过塘行非同寻常,显而易见,在过塘行里活跃着一支庞大的挑夫队伍,仅以扁担、草鞋与兽力连接着古道两头的内河航线,这些人用生命与汗水构建起祖国大地的南北通道,写下了人类物流史上可歌可泣的篇章。

### 艰苦卓绝“过塘行”

从江山码头至浦城的南浦溪的道路,行程艰难险阻,非笔墨所能描述。《浦城县志》有这样的记载:“两晋到隋唐,江河航运逐渐开发,中原入闽路线多经运河达钱塘江,溯江至江山,逾仙霞岭入闽(见图)。”

不难知道,早在两晋到隋唐时,我国南北交通的内河运输事业就已经逐步得到开发,仅仙



仙霞古道 廿八部  
位置示意图

唐宋之际,又军次打福建,被浙闽边界的仙霞岭阻隔,于是从江山岭上开辟出一条仙霞古道。仙霞古道是山入闽的一条主要陆上交通要道。一时间仙霞古道热闹非凡。官兵、文人、商人、贩夫络绎不绝。

从江山到浦城到廿八部有一天路程。从廿八部到福建浦城或江西广平也正好是一天路程。廿八部的两条古道恰好是仙霞古道中的一段。这里是过往客商必经之地。

廿八部从军事要塞演变成了商品集散地。南来北往的商客使这个古镇繁荣了好几个世纪。

陆见秋明 绘

霞岭前后长达一百多公里需陆行。此路为福州经建瓯、浦城逾仙霞岭,北上中原的主要大道。

进京士贾多走此道。自宋代以来,自浦城至仙霞关之路成为闽省出入中原之主要通道。”中央政府也就是依靠这条南北干线连接全国各地,官吏的迎送、漕运的北上,人来客往,大多依赖这条航线。

“仙霞古道”长达一百余公里,这是一条南北交通最便捷、最廉价的通道。这条古道二头(清湖码头至浦城)过塘行业的夫差,仅依靠人力、兽力,肩挑背扛,二百余里崎岖山路,将二地物资运来送去,行程之艰苦卓绝,恐怕在国际运输史上也是举世无双的。

在过塘行当差的人,又称驿夫,大部分人是按田赋摊派夫丁的,成为邑县的一大负担,其摊丁驿夫之苦,不堪言述。康熙《江山志》有这样的记载:“从清湖至福建浦城,路遥山险,驿传每一差需夫数万,去者每至道殒,回者出仅存皮骨,其苦累之情,惨于忍睹。”



大运河瓷：流淌千年瓷韵，见证运河繁荣，德胜坝遗址。

## 大运河瓷：流淌千年瓷韵 见证运河繁荣

撰文 \ 戚帅华 图 \ 鲁博



大运河瓷——元代粉青釉葵口盘

中国是瓷器之国，唐宋时期制瓷业尤为发达，官窑、民窑遍布各地。由于瓷器的易碎性，陆路长距离运输不仅不便而且运量较小，因而在当时，水运成为瓷器运输的主要手段。

在淮北市隋唐大运河博物馆，陈列着 700 多件保存完好的精美瓷器，其种类之繁多，几乎涉及隋唐至元初所有窑系、窑口。这些窑口瓷器的集中出现，勾画出隋唐大运河四通八达的水运网络。

### 出土瓷器窑口众多、品种丰富

安徽省淮北市位于苏、鲁、豫、皖四省接合部，处淮海经济区腹心，现为中国东部最大的能源基地之一，以工业为主要支柱产业。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收藏开始升温时，不断有淮北一带的农民拿着唐宋瓷器到城市中兜售，这引起了收藏界的疑问：那一带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古代瓷器？

大运河故道附近不断有瓷器出土，也引起了当地文物部门的重视，遂开始了征集和发掘。1999 年后，淮北大运河遗址进行了数次发掘，出土量最大的文物就是瓷器。

淮北市濉溪县文物管理所所长仲继元介绍，淮北柳孜运河遗址发掘时，出土了隋、唐、宋、元时期来自全国 20 多座窑址的近 10 万片瓷片，其数量之多，涉及窑口之众，品种之丰富，十分罕见。

瓷器的大量出土，催生了淮北市博物馆的新建。为了展示这些精美的瓷器，2004 年，淮

北市斥资 3500 万，建设了占地 40 亩、建筑面积 1 万平方米的淮北市博物馆新馆。2009 年，该馆加挂“隋唐大运河博物馆”馆标，成为全国首个以隋唐大运河为题材的专题博物馆。

近日，采访团一行来到淮北市隋唐大运河博物馆。我们看到，这些古代陶瓷有食器、酒器、枕头等生活用品，有人物、动物造型和摆件等艺术品，还有砚、水盂、滴等文房用品。按照器形，有碗、钵、盘、罐、壶、杯、盏等，几乎包括古人所有常用器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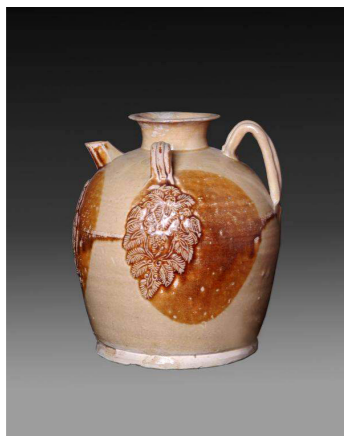
“起初一些瓷器专家看到这些瓷器，不敢相信是真的，它们不仅新，而且有些是没有见过的新东西。”博物馆讲解员刘叶说。

刘叶介绍，该馆目前陈列着 700 多件保存完好的出土瓷器，以汝窑、定窑、钧窑、长沙窑、越窑、寿州窑、邢窑、巩县窑等居多，主要分布在河南、河北、湖南、山东、安徽、陕西、江西、浙江、福建等省，地域广阔。出土瓷器的种类也十分丰富，有青瓷、白瓷、青白瓷、彩瓷、黑瓷等，涉及隋、唐、五代、宋、辽、金、西夏、元等多个朝代。

### 因大运河得名“大运河瓷”

大运河淮北段发现的瓷器数量庞大、窑口众多，年代跨度大，分布地域广，这在全国瓷器研究中实属罕见。

有专家为这类瓷器起了个名字：“大运河瓷”。淮北市隋唐大运河博物馆原馆长陶瓷鉴赏家王红五在其专著《大运河瓷》中，用“全、多、新、亮、精”五个字来概括“大运河瓷”。



他解释说，“全”指出土瓷器所涉及的窑口全；“多”指出土瓷器的数量多、品种多；“新”指出土瓷器大多数是未曾使用过的器皿；“亮”指因地下大运河弱碱性的水土环境，瓷器釉表接触不到有腐蚀或污染的物质，故而器表很亮；“精”是指出土瓷器中不少产品质量较高，其中不乏唐宋时期的精品。概括起来说，隋唐大运河通济渠段被黄沙掩埋的、出土的古瓷都应该属于“大运河瓷”。

“大运河瓷”为何品种如此之多、如此之全？仲继元介绍，最主要的原因，是大运河乃连接中国五大水系、覆盖全国的水路交通网，而通济渠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段，可以说是全国船只的必经之路。

仲继元表示，能在通济渠上行走的，一是当时的畅销瓷，即当时各大民窑的名牌产品；二是进贡品，一般是南方窑经过汴河进京的；三是外销瓷，一般是北方窑经过汴河到扬州港远销海外的；四是汴河沿岸的一些小窑口生产的瓷器，由于运输的需要经过汴河；五是汴河两岸百姓日常生活用瓷。这些瓷器可能因为水患、战乱、事故等原因被遗弃在运河内，经过日积月累，形成了丰富的遗存。

### 大运河助中国瓷器走向世界

“大运河申遗中国行”活动志愿者，河南省老字号、国家级“非遗”平乐郭氏正骨第八代传承人，洛阳平乐正骨学校校长郭宏涛说，陶瓷是易碎品，陆路长距离运输不便且运量较小。明

代学者沈德符在《敝帚斋剩语》中记述了陆地运输瓷器的艰难：“每一器内，纳沙土及豆麦少许，叠数十个，辄牢缚成一片，置之湿地，频洒以水，久之则豆麦生芽，缠绕胶固，试投之牢固之地（多石的地面），不损破者，始以登车。”

运输如此艰难，靠陆路运输，瓷器是难以行远的。水路较陆路少了许多颠簸，更适合长途运输。大运河的出现，为瓷器远销打开了便捷之路。

专家认为，“大运河瓷”不仅反映了大运河漕运的繁荣，对唐宋时期瓷器市场销售和南北流通也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大运河的出现，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陶瓷业的发展进程。长途远销不仅扩大销量、提供技术创新的动力，南北方制瓷业也借运河之便利，互相促进，共同发展。中国瓷器在唐代高度成熟，在宋代迎来巅峰期，运河功不可没。

“从大运河淮北段出土的瓷器看，南北瓷器交流十分频繁，更重要的是为瓷器的外销提供了重要参考。”市隋唐大运河博物馆特约馆员王志军说，中国瓷器外销开始于唐代，主要靠大运河。正是隋唐大运河的开通，使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陶瓷之路”连接起来，中国陶瓷由此走向世界。

（文章来源：洛阳网 [http://news.lyd.com.cn/system/2013/07/29/010265340\\_03.shtml](http://news.lyd.com.cn/system/2013/07/29/010265340_03.shtml)）

## 德胜坝遗址

撰文\安峰

德胜坝位于杭州德胜桥北现址，系杭州城北上河水系与下河水系之间的重要水利设施。德胜坝始建于唐代，是大运河拱墅段“三塘五坝”中的主要翻水坝。

其中三塘为上塘河、下塘河、子塘河（古新河），五坝为德胜坝、石灰坝、新河坝、猪圈坝、会安坝（位于艮山门外）。其最初是为了控制西湖水泻入运河而设的隔水坝。德胜坝于明洪武五年（1372）重建。设坝官一员，坝夫四十名，兼管猪圈、永昌、会安三坝。

旧时，从钱塘江进入运河的船只到德胜坝前，必须靠人力畜力牵拽才能翻坝而过。大船还须卸空货物才能过坝。因此在德胜坝一带码头、货仓众多。元代以来直至20世纪70年代，德胜坝是京杭大运河南终点的象征之一。其沧桑变迁中所蕴含的闸坝管理、坝神祭祀、码头兴衰等文化积淀深厚，是杭州城市变迁发展的重要见证。

今年秋雨淅沥的一天，我来到德胜坝遗址，堤坝的旧日痕迹荡然无存，但在德胜坝遗址碑上，图文俱全。2005年，杭州市档案馆用两年时间，在外文书籍中搜集出一批老照片，出版了《近代杭州图集》，其中一张美国传教士1891年以前拍摄的翻坝照片，作为历史的记录，镌刻在了德胜坝遗址纪念碑上。

“拱墅区文广新局立碑的时候反复考证，让碑尽量靠近德胜坝的核心位置。”米市巷文化站长丁菊珍说。我问她对遗址碑的感受，她说：“形状设计得像一本打开的书，让人回味。”

在民间，有不少草根的运河文化研究者，张震毅是其中之一。阳光灿烂的一个午后，我邀请他一起来解读这份珍贵史料。翻坝照片的复印件，摊放在一家餐厅的桌上，因为长时间揣摩、分析这张老照片，张震毅对其中的每个细节都烂熟于心。运河文化研究界中，是他最早提出该照片拍摄地在德胜坝：“德胜坝那时候应该是30度左右的斜坡，坝顶到水面，落差在7米以上。船，应该是从杭州内河翻坝进大运河。水牛也是帮助翻坝的工具。”



张震毅推断：“这幅照片也有可能是摆拍，因为翻坝船只到达坝顶，将要往前下滑，水牛这时候应该反向牵引，否则大船滑速过快，会出现意外。”

张震毅对德胜坝的熟悉，源于两个原因，一是在德胜坝当了10年的装卸工，研究过当地地形，第二是参与了《杭州交通志》的撰写，后一个原因，可能更为关键。

“1987年，我以一个搬运工的身份得到某苏姓领导的赏识，暂调至杭州港务处机关从事文字工作，半年后又调至港务处内的交通志编

写组工作了10个月。1988年的春天，港务处的交通志编写组拟定了一个课题，走访100个老码头，留一份运河码头变迁的口述资料，当时的编写组实质是老干部的临时安置所，人数虽多但真正能干活的就我一个，走访任务只能由我来做。

“1988年8月我离开编写组时，大约已访问了四五十人，由于通知我离职的事情很突然，我未来得及将记在笔记本上的东西抄成正规的资料卡片（另一些在档案馆、图书馆收集的素材，我早已制作成了五百多张卡片），只是将那

笔记本带回家束之高阁。如今那本静静地安睡二十多年的小笔记本，成了杭州民国运河口述历史的珍宝。”

## 一、张震毅：实地寻觅德胜坝的真相

张震毅如今大部分时间隐居在临安，享受田园生活。我本想驱车前去临安拜望，他却因处理姐姐的事务来到了杭州，于是我们有了会面的机会。

会面之前，我的助手荀丽已经和他通过话，对他有了一个初步的印象：“一定是位儒雅的老先生，话语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头发没有全白应该也是花白吧，喜欢拿着相机捕捉生活中的美。在家戴着一副老花镜，拿起笔写写文章。”

他第一次在餐厅出现，荀丽吃了一惊。“我之前的这些印象完全无法形容眼前这个人。皮肤黝黑，身体矫健，头发乌黑，穿着朴素，不像文人像农民。听到他与安老师的谈话，又渐渐接近第一印象中的文人了。他的讲述有条有理，知识面广，让人对眼前的这个‘农民’由衷地赞叹。虽是第一次见面，却完全没有拘束感。坐在他边上吃饭，听他说说过去的事，再说说现在他在临安的农居生活，觉得他像是早就认识了的大叔。”

张震毅说，历史上德胜坝的地位很高。“是京杭大运河杭州段的一个重要的地理标志点，历史上的几百年时光中京杭大运河在此戛然而止。德胜坝 1970 年被拆除，在此之前，小一点的船只尚可顺着坝体上的滑槽，靠人力或畜力牵拽翻坝，进入杭州城内河道，而大船到此便再

无水路可走。从这个意义上说，德胜坝是京杭大运河的真正南端终结点。

“德胜坝成为京杭运河的南终点，同西湖水的下泄出流也有密切关联。

“西湖接纳诸山之水，满则必溢，古时西湖有两个出水口，涌金闸和圣塘闸，两闸之水汇于杭州城北古新河，在德胜坝北 100 米处的黑桥头下注入运河，这是千里运河接纳的第一注自然来水。

“从历史上水系的走向看，德胜坝以北的运河河道是一条自然形成的河流，早在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前即已存在。它是西湖水外泄的通道，元末张士诚的开凿，不过是将自然形成的河流疏浚一番而已。受制于古代水利技术的局限，难于处理运河水位与市内河道水位的高差，在西湖水入运河的水口附近，筑坝隔水，使大运河止于此地，便是合乎情理的事情了。相传乾隆皇帝游杭州时，那龙船也是到此止行，泊于黑桥头外的运河边上。”

张震毅上班的地点，当时叫杭州码头装卸公司二连，“文革”前那个地方叫德胜坝中队。“干活在露天，就是湖墅夹城巷往东进去的德胜坝码头和货场，休息吃饭的老房子，门牌号为新码头 3 号，隔了一条古新河，要翻一座叫黑桥的破烂小石桥才能到达。老房子又大又旧又破（房子旧址在今左侯亭旁），二连有一百多工人，坐在那青石板铺就的厅堂里，也没啥拥挤的感觉。

“新码头 3 号前面的几间房，是我们这些搬运工的更衣室兼工具房。后厢房以薄板壁隔开，



1970 年拆毁的杭州德胜坝，就是这样的河坝，用以隔断南北两侧河道的水

住着一户人家，两个男孩和我们年纪相仿。他们家的男主人从来没有露过面。比邻而居多年，那一家人进进出出从不和我们说话，如同永远的陌路之人。最近看拱墅区许明主编的《运河南端说码头》，考证出那户人家祖上是清代大学士王文韶管家，也姓王。

“那年头，特别勾起我兴趣的，还有新码头 3 号大房子东南那一圈青石板铺就的码头。那时虽说工作地点在德胜坝，但逢到业务清淡的时候，还需整个拱墅区的运河边上去干搬运活，最远的一直要跑到瓦窑头，即今天拱北小区还要出去几公里的地方。这样我就有机会去看各式各样的码头。各处码头看起来，我就发现了一些很特别的东西。

“运河沿岸所有用大块石料垒起来的码头，用的石料一律很杂，有红石，有青石，还有石灰

石，好像做码头时那些石料都是各处捡来的，只有新码头 3 号外的那码头特殊，用的全是同一个地方出产的青石料，当时的德胜坝主要是卸石料的码头，我天天接触，也认得了那种石料，它产自余杭的獐山，那是一种质地非常好的花岗岩。

“同单位一个老工人张小宝，在码头上用油毡搭了间房子居住。我心中的种种疑惑后来忍不住，就去问张小宝。他一脸地骄傲地说，他住的地方是乾隆皇帝的脚踏过的呢！乾隆皇帝游江南下船的新码头就是这个地方！新码头 3 号外的码头，不管厚的、薄的、长的、短的石料，统一都用这种一样的料，几百年前建此码头时，猜想官府一定是拨专款采购了这批石料，显现了皇家用物的考究。”

张震毅说他当年所见新码头 3 号一楼，格



局上有点怪异：“整个厅堂不做一间隔断，铺的清一色大块青石板，粗大的梁柱撑起了整座房子，层高达四米左右，朝南的一面没有档墙或门窗。”这座房子南面，呈现完全的敞开式，对着古新河口的“新码头”，很像乡下祠堂的模样，“如果把这房子当年的用途想象成皇帝登岸时的接待用房，应该是合情合理的。”

张震毅认为德胜坝的拆除应该在 1970 年，理由是亲眼所见挖泥船的大铁斗一点一点把曾经的德胜坝挖去。“德胜坝到猪圈坝（武林门）的河道古已有之，拓宽成现代航道全是机械化作业，70 年代初使用了大型铁驳挖泥船，运河泥也是用的铁驳船。”邹滢颖小姐为《运河南段说码头》所写的引子提供了佐证：“在杭州境内的运河，由北向东贯穿全城，起自余杭县博陆镇东，终点原在德胜坝，1969 年下半年开坝延伸 3.95 公里，至艮山港止，全长 42.24 公里。1983 年国家决定再延伸，开挖 6.97 公里新航道，并于是年 11 月动工，终点移至三堡船闸。”

## 二、顾东华：德胜坝邻居的说法

现年 80 岁的顾东华，1945 年 9 月 13 日从浙江萧山云石乡出发，随家人到杭州运河边，住进了德胜坝夹城巷（原址 114 号）。“德胜坝坝场，起码有 4 个足球场这么大！”顾东华老人说，坝场的地基是三合土烂泥地，也有鹅卵石路面，“记得当时德胜坝的西北角有块大场地，主要堆放黄沙、石子、生石灰（原块），以及砖头、白云石等建筑材料。”

“德胜坝上游是艮山河终端，下游是京杭大运河终端，上下游高低落差约两米，一般大船是不能过的，绍兴的乌篷船，手划船，小型船可以抬、推、拉，‘拔坝’通过。大船来，停在卖鱼桥轮船码头和德胜坝下面。”老顾记忆中的德胜坝，长约 20 米，宽约 60 米至 80 米，两面斜坡，上面陡下面斜。坝上总有一些拉人力大板车的车工，随身两米来长的粗白布是他们的宝贝，“发力时系在腰间，累了可以打地铺，出汗了可以当毛巾”。

德胜坝南侧，东西走向的德胜桥是夹城巷与长板巷的分界线，桥东叫长板巷，桥西叫夹城巷，湖墅八景之一“德胜望月”就出在此处。

“但是我们老百姓，称桥上看月亮为‘德胜孵月’。”在附近生活 50 多年的杜铭峰说。

孵，原意是孵化，杭州话的引申义是等待。夏日入夜，运河人家摇一把芭蕉扇，男男女女站在桥顶看月亮，“比在西湖平湖秋月看月亮还要漂亮”。德胜桥上看月亮，还有“夹城夜月”、“德胜伴月”、“德胜望月”之说。

德胜桥西现址夹城巷，当年码头工、搬运工、车夫、车工、船老大时常出没。

“夹城巷有三绝，一是阿昌做的豆儿，又酥又脆，一般下午两点到小巷叫卖。阿昌脖子上套根带子，两头吊牢放豆儿的竹筐，搬运工们花两分钱买一盅，弄点老酒咪咪，其乐无穷。”顾东华说的另两绝是“凤桂卷烟”和“癞痢烧饼”，“凤桂卷烟”老板专收一些别人捡来的烟蒂，剥烟丝晾晒后卷成香烟出售，号称“自奉牌”或“自动牌”

香烟。“癞痢烧饼”面料好，做工细，出炉后破棉袄盖盖，装在一竹筐里，挂在“癞痢”头颈下沿街叫卖，生意蛮好。“但是癞痢老板本人头上没有癞痢，相貌清秀得很。这是绰号，叫叫的。”

“三家店的后代现在仍住附近小区。‘癞痢烧饼’的女儿和女婿，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还在卖鱼桥头老茶店里卖烧饼油条。”那时候，顾先生是卖鱼桥五交化商店的经理。

### 三、德胜坝与会安坝：均有集市风采

我走访各处堤坝，有一个粗浅的印象，凡稍有规模的堤坝，往往类似码头格局，形成集市，三教九流，鱼龙混杂。这一点在了解会安坝时也得到了印证。

会安坝遗址，在杭城的艮山门外，现在的建北桥中央，已成南北向六车道，是“三塘五坝”中最近东南角，唯一不在拱墅区的堤坝。

小时候住会安坝的夏梓华向我介绍，当地人称会安坝为吊桥，坝有两只“涵洞”，贯通东西，民间叫“吊桥双龙”。东边一道高 3 米、宽 4 米的木栅板，让上涨的内河水流入“双洞”，汇到大运河，起到调节水位的作用。

只要放水了，那些撒渔网的、搁鱼竿的、放鱼钩的，还有用大竹筐守候在“双龙口”的，只等鱼虾冲下来落网，落筐。

夏梓华小时候，会安坝一日三市，酱酒、剃头、蜡烛、篾竹、箍桶、豆制品、果品、杂货，各种店铺云集，戴记修车行、朱文华裁缝店、王自立郎中，各种名号聚集这里。夏梓华印象深刻的

还是两位道士，一个陈道士，一个王道士。“凡是白事都要请道士去做道场。点树灯，鬼吹灯，道士束发盘髻，围了树灯念念有词，伢儿看了多少有点慌兮兮。”

“坝的西北角是陈氏茶馆，4 间开间门面大小，每天先用一只炮仗炉子烧水，开水装在一铜质长嘴茶壶里，给顾客加水。”喝茶的都是老顾客，有船老大、拉黄包车的、踏三轮车的、沙田里的鱼贩等等。

夏梓华说：“1960 年前后，一壶茶配一只盅儿收 3 分钱，一日分早中晚三批。如果有时草班唱戏，一男一女搭档，男的弹拉吹，女的演唱；或者有大书先生开讲，再另加 2 分钱演唱费。”

坝的北角是家“小昌”卤味店，六七个平方，圆角形，悬空，几根木柱子直接落到河边生脚，整座楼好比空中楼阁，店里有猪头肉、猪脚爪、猪耳朵、素肠等卤味。“买一包卤味，配上二格臭高粱，坐到会安坝的青石条上咪酒，真是味道。”

东南角寿记年糕店，头戴绍兴毡帽，腰系黑色围裙的老板天未亮就打好年糕，印版、线板年糕，任你选择。上世纪 50 年代末，寿记年糕店改为小书摊，女老板兼当伙计。“一个 30 来岁的胖女人，穿件苹果绿凡立丁旗袍，头发烫得松松起，一副富态相，但是常常为小人书收费多少，跟熟人争得喉长气短。经营难喔。”夏梓华感叹，神色略显惆怅。

会安坝遗址，现已成为建国北路，路上车水马龙，滚滚红尘。

许明主编《运河南端觅遗址》



守住拱墅的根和魂 留住拱墅乡愁记忆  
好「运」「河」你相伴  
——2018年元旦拱墅区再开启「走大运」活动  
第四届「解文杯」运河幼儿故事大赛落幕



## 守住拱墅的根和魂 留住拱墅乡愁记忆

拱墅区大运河文化研究院成立  
老物件展从1月18日持续到3月4日

运河通南北，文化传千年。京杭大运河繁荣了沿岸经济，孕育了运河文化，衍生了民俗文化。拱墅运河段是杭州段运河古迹保存最完整、底蕴最深厚、资源最丰富的一段。拱墅区拥有“中国大运河”这一世界文化遗产和“半山立夏”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拱宸桥、富义仓、祥符桥等21个国家级、省级和市级文保单位和文保点。建成开放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等5大国家级博物馆，保护修缮了小河直街等3大历史街区，恢复重建水田畝遗址、战国墓遗址等23处历史文化遗存，打造了“运河文化看拱墅”这一金名片。

近年来，拱墅区在加快经济发展同时，着力统筹发展社会各项事业，大力保护、传承和弘扬

优秀文化，全面实施运河文化带建设，努力打造历史文化底蕴与现代品质生活相融合的大都市中心城区。区第七次党代会提出了“文化引领”战略，要求大力传承和保护历史文脉，留住根和魂，让拱墅彰显运河沿岸城区的独特韵味。

现今，中国大运河的保护和发展正面临一个重要的历史机遇。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两次对大运河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认真“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历史文化资源，为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指明了方向。为了进一步挖掘、保护、记录、传承、发扬运河历史文化，为“运河沿岸名区”建设注入更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拱墅区决定成立“杭州市拱墅区大运河文化研究院”。

大运河文化研究院将着眼于中国大运河水系流域，重点研究大运河拱墅区域资源，梳理整合区历史文化资源和研究成果，提交运河区域研究的建设性调研成果，推动运河沿线的联动，做好运河文化宣传等，全力助推运河沿岸名区建设。

2018年1月18日上午，杭州市拱墅区大运河文化研究院成立仪式暨“留住乡愁记忆”老物件展开幕式将在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正门举行。省、市、区相关领导、专家和热心运河人士将出席本次活动。

大运河研究院成立同时，“留住乡愁记忆”老物件展开幕式也将同时举行。在2017年拱墅区“城中村”拆迁期间，我区成立了“文保小组”，抢救性保护了一批“老物件”和民俗童谣，守住了拱墅的根和魂，留住了拱墅的乡愁记忆。

此次展出的300余件老物件是拱墅区城中村改造期间征集的431余件老物件中的精品，主要为老底子杭州居民生产、生活类用品，有家具、农具、电器、服装等，包括大户人家的外牌楼、雕花床、雕花柜子、战国印纹硬陶罐、民国土地所有权证和税票等，展现了几个时代的缩影。展出物品年份从战国时期至解放后，跨度较大。希望通过这次展览，来追寻旧时生活印记，感受社会发展变迁。另外，还挑选了征集的166首民俗童谣中较有代表性的童谣在开幕式现场进行表演。老物件展从1月18日持续到3月4日，展出地点在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内，欢迎大家前来参观。



## 好“运”“河”你相伴

——2018年元旦拱墅区再开启“走大运”活动



白驹过隙，十二年一轮回。

2018年1月1日上午，拱墅区第十二届“新年健走·香积祈福”暨第五届“新春送福”活动火热开锣，千余市民通过健走方式迎接新年的到来。

今年的新春走运，与2018年中国（杭州）新年祈福走运大会同步举行，以与京杭大运河沿线城市媒体主播互动的方式，联动运河沿岸十八座城市（江苏段、山东段、天津段、通州段）市民一起走大运。浙江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向全省同步现场直播，KK直播也在向全球直播。

上千名市民分成42支健走代表队，从拱宸桥运河广场出发走最美运河游步道，途经青莎公园、北新关、大关桥，到达香积寺广场祈福墙，签名并领取“新年心愿贴”后折返回运河广场（全程6.0公里），前100名折返的走路达人还可获得主办方准备的手写对联和新春“福”字大礼包。

同时，在运河广场上，20多位省市书法家执起生花妙笔，写下1000个吉祥“福”字，将满满的福气送给广大艺术爱好者和普通市民群众。一个个写好的“福”，喜气连连，传递着所有人对美好新年的祝福与期盼。这也是中国作家书画院浙江分院、拱墅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连续第五年在运河文化广场举办面向市民的新春送福活动。

流淌千年的中国大运河是世界文化遗产，也是杭州当之无愧、最有影响力的世界级城市品牌。“走运”是我们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新年健走”活动最早是由拱墅区在2007年正式提出并成功举办，至今已是十二年一轮回，成为杭城一项新民俗。在杭州，元旦“走京杭大运河”是新的一年开年标志，赢得一个“走运”



的好口彩，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市民热情参与，“走运”不仅是一项体育运动更是成为运河畔城市特有的文化。此外，拱墅除持续打造新春走“运”这一健身文化品牌，4年前更是把“香积祈福”这一传统民俗活动再现于世。这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也是对运河文化与时俱进的诠释，更是将全民健身运动与民俗文化有机融合的尝试。

本次新春走运，十二年一轮回，一起和新年来一次走“运”的约会吧！🍊

## 第四届“解文杯”运河幼儿故事大赛落幕

撰文 | 赵莉莉



1月13日下午,第四届“解文杯”运河幼儿故事大赛在拱墅区图书馆落下帷幕。来自拱墅区各个幼儿园的29位小朋友,在这里一决高下,展现了故事的魅力,展示了自身的风采。经过激烈的角逐和评委公正的评价,共评出了2位特等奖,6位一等奖和11位二等奖。参加复赛的选手相当于都获得了三等奖。

本次大赛从幼儿园的初赛,到图书馆和解文教育的复赛,到决赛共历时两个月,几千名幼儿参与其中。本次决赛的选手是从200位复

赛选手中脱颖而出,因此个个身怀绝技,故事精彩纷呈,讲演抑扬顿挫,再加上得体的肢体语言,让观众时而开心一笑,时而会心称赞。

这次故事大赛改变了以前只讲一个自选故事的方法,采用了自选故事加现场抽签的看图讲故事的形式。孩子们一点也没有被现场抽签讲故事难倒,现场看图讲故事也都讲得很顺畅,想象也很合理、大胆。

比赛结束后,大赛的评委,著名的语言艺术家,电视节目编导老开心在点评中说,孩子们表现都很棒,故事充满童趣,表演一招一式很有范儿,年纪那么小就能讲这么精彩的故事,很难得。以后在讲故事内容上还可以更宽泛,不仅限于童话故事。

本次大赛是纯公益赛事,由拱墅区图书馆和解文教育共同举办,“书香拱墅·人文运河”是这次大赛的主题。众多的孩子从故事大赛中得到了成长和锻炼,运河文化在比赛中得到宣扬,书香拱墅在大赛中得到践行和推广。愿更多的孩子爱上阅读,愿更多的家庭关注运河文化。



解文教育是坐落在大运河卖鱼桥边的一所书院。书院窗前是就是一条历史悠久的余杭塘河,她从余杭镇经仓前镇、五常到信义坊,经卖鱼桥汇入京杭大运河。

这里是历史人文荟萃之地,也是孩子们求知、成长的快乐摇篮。

解文教育研发了大量国文课程,涵盖了从学前到小学的九年课程,主要包括:绘本阅读、解文识字、启蒙阅读、看图说话、看图写话、大笔作文、小古文阅读、国学等等。

解文教育的课程注重趣味性和实效性,书院以国文课程为载体,以激发兴趣、引导方法、培养习

惯理念,让众多的孩子在这里度过了快乐、充实的时光。

解文教育每年举办大型公益的运河幼儿故事大赛,为学前幼儿提供锻炼的舞台,推广了早期阅读,促进了运河文化的交流。

解文教育每个月举办一次公益运河大课堂,指导小学的阅读、作文,图书馆的报告厅座无虚席,深受孩子的喜爱。

解文教育每年还举办多次“一元城市生存挑战赛”、冬令营、夏令营等活动。让孩子自食其力,学会生存,学会交往,学会合作,学会感恩,健全孩子人格,让孩子们全面发展。

